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2 年 4 月 30 日第 4 期

## 本期目录

### 书海泛舟

梁志福 独特而重要的视角——介绍《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

编 者 《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前言

编 者 《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后记

董国强 政治高压与宣传误导下的自我救赎之路——读《邓克生文革“思想情况回报”全编》

### 文摘

张春亭 难忘的往事

肖健卿 西藏文革二三事

王 炎 口述史的魅力在细节——由“老舍之死”谈文革口述史

### 风云人物

司马清扬 姚登山与周恩来

### 蓦然回首

李正权 我的一段极左经历

王 锐 一个短笛手的命运

### 史林一叶

杜钧福 文革中陈战武的忆苦报告

孙言诚 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未删节版）

### 编读往来

1、建生提供原北京 101 中死于江西武斗的二人追悼照片

2、范世涛来信提两点意见

---

### 【书海泛舟】

## 独特而重要的视角

——介绍《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

梁志福

肖健卿、李近川主编的这本书，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汇集了二十多位作者回忆文化大革命中担任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时各自经历和见闻的四十余篇文章，较为集中地反映出在那大动乱年代里身负重要使命的作者们在不同地区、不同层面所经历和了解的文革情况，十分珍贵。其中不少文章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过，这次有的又作了修订补充。当然，对于当时先后有二百多人参加的这一工作来说，这二十多位作者只占其中的十分之一，因此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愿能有更多的知情者也能像本书作者们这样写出各自的回忆。

## 附该书文章篇目——

前言

回忆中央文革记者站

在中央文革记者站材料组

通联组概述

附录：关于中央文革下属机构的回忆

附录：中央文革记者站的通讯员队伍组建前后

难忘的往事

“文革”中几件要事的起因

四川“文革”的一段往事

我的一次突击采访

面对中央“红头文件”

成都二月风云

重庆一月采访简记

“文化大革命”之初贵州见闻

贵州夺权前后

难忘春城六日

昆明两大派的争斗与初步联合

西藏文革二三事

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的经历

黄永胜向我下毒手

受毛主席赞扬的一篇报道

钢铁长城 功垂青史

颗颗都是纯真滚烫的心

河南纪事

王光美去桃园以后

《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文采访过程

难忘京津三年间

采访中与魏传统将军结下的情谊

从钓鱼台到记者站

我在外交部亲历的几件事  
在华北农村组  
调查焦庄户民兵情况  
调查“五·一六”  
回忆去淮南制止武斗  
与我对饮的许世友上将  
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  
参加周总理接见  
在南昌记者组  
毛主席为我改文稿  
记者与书记  
陕西驻军支左中开展谈心活动  
赴西北调查琐记  
中央批转哈师院造反团“团结大多数”经验的内情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名称的来历  
从中央文革记者到周总理联络员  
关于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三首诗词  
后记

---

## 【书海泛舟】

### 《飞鸣镞——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前言

编 者

“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迅猛开展以后，鉴于有些地方党政机关已不能正常运转，亦不能向中央反映情况，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中央常委会上提出，选派一批记者，去全国各地调查了解“文革”开展情况向中央报告，使中央能及时观察和掌握全国运动。因而也就有了1966年9月成立，存在近3年并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特殊机构——中央文革记者站（简称记者站）。

记者站成立初期，主要是从新华社驻各军种和大军区的机构中抽调20多名人员参加，后因运动深入发展，调查“文革”情况的任务日益繁重，党中央又从中央办公厅、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社、工人日报社、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放军政治学院、解放军各军种和各大军区选调几批干部，先后共有200多人，参与了中央文革记者站的工作。

记者站的记者按照中央规定，向中央政治局常委真实、全面反映各地“文化大革命”情况，分别以新华社、《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等报刊记者名义，常驻全国各省市机关所在城市、问题突出的中小城市、重点工矿交通企业和商贸口岸及农村社队，调查运动和生产建设情况。后期又因

人手不足，吸收了一批在校大学生，作为通讯员和联络员，协助记者调查采访，整理摘编上报各地来京人员的汇报材料。记者们调查采访的层面非常广泛，基本涵盖了全国各个行业。

记者站是中央的“文革”动态调查机构，名义上受中央文革办公室（办事组）领导，中央领导同志经常亲自过问，具体指导。毛泽东主席对记者站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记者要全面地反映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多做调查研究，要进行分析。不要只反映坏事，不反映好事。”为记者工作指明了方向。毛主席还多次批转记者的稿件。这些被批转的稿件，有的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有些被加上按语，或配发社论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突出位置发表，指导运动的开展。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总理对记者站的领导更为具体，曾多次接见记者站来京集训的全体人员，并作了重要讲话，交代任务，为记者确定了工作方针、原则，还及时纠正记者工作中的问题。他除了批阅记者站编印的《快报》《文革简报》《动态清样》等内部刊物和部分记者的材料以外，还多次听取驻外地记者的口头汇报。他让记者参加中央解决各省市问题的会议，了解中央精神，收集上报与会人员反映的情况。在个别地区形势较为严峻、事情比较紧急的情况下，还派记者去接待群众、制止武斗，并去做各派大联合的工作，给被围攻的领导干部传达中央的指示等等。把记者作为机关工作人员来使用。

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员，如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以及刘志坚、谢镗忠、穆欣等，也曾对记者做过指示，下达任务，听取汇报，还审查过记者的部分稿件。

由此，记者接触的上层情况，是多方面的。

为保证记者能较好地完成任务，中央有关部门曾联名多次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党政军机关，向记者提供食宿、交通、通讯、安全等方面的保障，不得干预他们的调查活动等等。所有这些有力的支持，为记者在当时全面动乱的形势下，排除各种障碍和干扰，亲临现场，深入了解情况，顺利开展记者工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为给中央报告真实情况，记者普遍下到最基层，始终处于“文革”运动第一线，不仅参加中央的会议，参加各省市、各大军区常委会等各种会议，更多时候是深入工厂车间、农村社队的田间地头、各派群众组织之中、关押干部的“牛棚”和武斗现场……广泛接触党、政、军、民、学各界，各种观点和各种职务的人，既有群众组织，也有被揪斗的领导干部和军队的“三支两军”人员；既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和逍遥派；既有中上层人士，更有最基层的普通人；既调查“文革”运动，又了解生产建设；既了解正面经验，也调查反面问题。对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相关的人物，都是直接到现场，了解当事人，掌握第一手材料，并反复核实，力争弄清真相。尽管记者报道中的观点，因受“文革”指导思想和当时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难免有片面、偏颇甚至完全错误之处，但绝大部分调查列举的事实，基本是符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

由于记者有特殊工作条件的保证，触角是广泛的，视角是独特的，见闻更是丰富多彩的。既看到了运动中的盲从和疯狂，也看到了运动中的迷茫不解，敷衍

变通，甚至抵制和抗争；既看到了分裂和争斗，也看到了维护团结、稳定局势的艰难努力；既看到了思想的扭曲、精神的堕落、良知的沦丧，也看到了真理的威力和正义的呼喊；既看到了由发迹到衰败的昙花一现的表演，也看到了从倍受压制、屈辱到中流砥柱的正义复出；既看到了生产建设的削弱和破坏，也看到了坚守岗位、忠于职守、加倍工作而取得的工作、生产建设成果……

当年的这些记者，现在大都已七、八十岁。他们每当回忆起过去那段特殊的经历，总觉得应该趁现在身体尚健，记忆力尚好，抓紧把它撰写出来，公布于众，供人们研究总结，引出正确的经验教训，这是在有生之年应该做的一件有益的事情，也是一种历史的责任。

记者当年调查采访所写的材料，现在尚保存在档案馆里，没有解密；记者当时的笔记本也大部分已经上缴。现在只靠记忆和手头掌握的有限资料，写出的事情，可能不足当时见闻的百分之一、二，但相信它对“文革”的研究，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于是就产生了这本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时间间隔已四十多年，现在回忆起来，难免有缺陷和不足，期待经历过“文革”的人，特别是书中所叙述事件的当事人，给予补充和纠正。

目前，这本书中所收集的资料，只是当年中央文革记者站部分记者的回忆文章，且大部分已分散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发表过。我们相信，现在集结出版，也将起到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或许会使更多的当年记者同事引起回忆，也动手撰写一批文章，将自己在采访中亲历的珍贵材料保存下来，为“文革”史的研究起到应有的作用，尽到应尽的责任。

2009年2月

---

【书海泛舟】

## 《飞鸣镞——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后记

编者

此书中文章的撰写、汇集出版，经过较长的酝酿、发动和写作过程，最早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由当年记者站的谭吉安、肖健卿、王焞长，张维辛共同发出了写记者站的倡议，得到了一些同事的积极响应，写出了一批回忆记者站工作见闻的文章，为撰写工作开了个头。

2002年，当年记者站的李近川参加了这一行列，并首先在《百年潮》等刊物上发表了回忆记者站的文字，产生了一个突破性的效果。从此，撰写的步伐也随之加快，对作者的发动面也逐步扩大。经过几年的努力，又写出了约几十万字的文章和资料，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部分。在此基础上，经大家共同商议，为相互启发记忆，交流写作情况，核实已写出的文字史实，于2007年10月联系一部分掌握记者站情况较多的同事，聚会于北京，决定核对修改写出的材料，进一步继续征集史料，最终编纂成书，公开出版，并指定由肖健卿、李近川二人为

主要编辑，对大家的文章做进一步的文字加工，最后主编全书。

随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参与的人员更为扩大，撰写出的稿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基本具备了汇集成书的条件，因而也就有了此书产生。纵观这些文章和资料的内容，涉及到“文革”时全国 29 个省市区 28 个省市区，反映出了记者站的概貌和在全国的重要见闻。已写出的这些材料，基本上是作者个人的见闻，因而在汇集成书时，遵循文责自负的原则，编辑人员对文中的观点和事实，基本上不作改动，只在文字表述上做了某些技术性的斟酌和删节，保持了原作的原始特性。

收入此书中的材料，只反映了部分当年记者的见闻，只是全站人员接触见闻的极小部分。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希望更多当年同事行动起来，积极参与这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回忆披露出更多的重要史实，通过印书保存下来，留给后人，避免其失散湮灭。这是我们这些曾站在“文革”第一线，亲历重要历史事件见证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有新作者新作品的加入，将使以后的续集内容更加充实。准备随后计划参与此事，或对本书内容提出补充修改意见的同事，请随时与本书的编者联系。联系电话是：028-87577535 或 010-82782377。

此书的资料征集、撰写，得到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张化、沈传宝，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吴江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得到了原中央文革办事组负责人王广宇同志的支持，在这里，我们代表当年同事，对他们热心指导帮助，致以诚挚的谢意。

为本书的编撰提供了素材、线索、意见及其它帮助的人还有：姜文品、张翼、谭吉安、张维辛、李次膺、张广友、张超、刘桂莲、于国厚、柯愈春、张必忠、王锡宾、陈梅璞、孙朴方、李生荣、贺源、王志刚、朱士高、雷光鸿、徐志明、鹿建兴、冯英龙、杨福绵、李桂芳、王录珍、郑澍卿、卜训荣、张根成、姚克强、于逢源、杨立功、刘永礼、赵秀珍、成一、徐海亮、杨民清、王金岗、武将、丑运洲、蔡善武等。他们为本书的成书出版作出了贡献。

编者 2009 年 3 月

---

## 【书海泛舟】

### 政治高压与宣传误导下的自我救赎之路

#### ——读《邓克生文革“思想情况回报”全编》

董国强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结识邓克生老先生（原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党组书记兼副所长、省委党校副校长、著名经济学家）的二公子邓伍文先生，并获赠邓家最近自印的邓老文革期间“思想情况回报”全编。

我对这本自印的小书特别感兴趣，与我所从事的中国知识分子专题研究与江苏/南京文革群众运动专题研究紧密相关。以我的浅见，相对于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各种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言，我们至今对中共党内知识分子群体知之甚

少。这主要是因为，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创办了许多同仁刊物，可以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个人情感与政治主张，因而留下了大量的研究素材。而党内知识分子受组织纪律观念和革命伦理道德的约束，在公开发表论著时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考虑到“党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正确”等因素，因而较少能够有真实反映个体思想与个人情感的文字存世。在地方文革史研究方面，如果我们大致可以将学生群体（含大中学校青年教师群体）、职工群体（含一般干部、公务员）和领导干部群体看作群众运动中的三大社会主体，我们对前两者在运动中的感受、诉求和活动的了解，要大大多于对后者的了解。主要原因在于，领导干部群体成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一般都城府很深。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他们都很少会轻易向别人真正地敞开心扉。因而，邓老留下的这批原本不想公开发表的“思想情况回报”，便成为我们进行相关研究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标本。

有关邓老的家世、生平、学术思想和他为人处世的一些道德规范，可参见由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策划、诸文和赵宁乐编辑、南京大学出版的“当代江苏学人丛书”中的《丹枫傲霜——经济学家邓克生》一书。基于“丛书”的编辑指导方针，以及特定的历史语境，这本出版于2001年的纪念文集，对邓老在文革期间的活动和思想几乎没有涉及。在我看来，无论是就邓老六十五年的个人生涯而言，还是就当代中国历史而言，文革十年都不是一个短暂的、平凡的、可以一带而过甚至忽略的瞬间。这十年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及其社会影响，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所以这部分内容的缺失，不能不构成该书的一大遗憾。而这批“思想情况回报”材料的问世，正好可以弥补这种遗憾。

这批“思想情况回报”记载的内容，始于1966年11月13日，终于1969年4月22日，共122份，约12万字。加上1966年9月18日的一份“认罪报告”，以及作者和编者的若干注释性文字，该书实际上涉及1966年9月至1969年5月的许多情况。从文革史研究的阶段划分来看，这是中央高层路线斗争与地方群众运动相互交织、运动走势反复无常、矛盾冲突最为错综复杂的时期。国内外学界对此的现有认知与诠释，还是很不够充分的。

由于邓老早在运动初期就被旧省委作为替罪羊抛了出来，后来又在天下大乱时继续接受“群众专政”，所以他对“牛棚”以外发生的地方文革运动走势——如1966年11月以后跨单位、跨行业群众组织的出现，1967年初的“一·三武斗”和“一·二六夺权”，1967年3月以后的“军管”和“镇反”运动，1967年夏天的派性武斗升级和“倒许”（打倒许世友）风潮，1968年春天“革委会”成立后的派性斗争的持续等——所知甚少，且难于理解。不过他从身边发生的一些突兀现象和街头大字报的只言片语中，还是感知并记录了一些重要的事件，如“一·二六夺权”前后的“好”、“屁”之争，如1967年春两派群众组织对干部群体的争夺，如1967年底至1968年初北京谈判期间杜方平、高啸平被中央作为江苏两派背后的“黑手”揪出，如1968年3月省、市革委会成立后的内部斗争和“杨余傅事件”公布后南京军区内部的整肃，如1968至1969年间“清队”过

程中运动矛头的转向，等等。这些在身陷图圉的邓老看来断断续续、相互矛盾的信息，却为我们今天理解与诠释当地文革运动的阶段性转折和各阶段的主要矛盾冲突提供了重要的旁证材料。

邓老早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当然不会有很多社会活动。因而他的思想活动和心路历程自然成了我们关注的重点。如果把“思想情况汇报”与《丹枫傲霜》对照起来看，我们既可以看到邓老身上一些恒定不变的东西，同时也可以发现一些前后矛盾的现象。恒定不变的，主要是其淳朴善良的天性、随和率性的待人处事方式和一心为公、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尚品格。这一方面表现在被迫“检举揭发”别人和应付“外调”时，他能够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另一方面表现为，出于维护党的利益和“革命群众组织”威信的考量，他对来自各方的质疑、指控和处罚决定统统照单全收。前后矛盾的，主要是其思想观念变化和日常行为举止。这一方面表现为文革前后他对个人政治历史和学术观点的不同评价，另一方面表现为他对中央和地方一些领导人及其所倡导的各项政策的截然不同态度。简而言之，在接受“群众专政”期间，他似乎从一个乐观开朗的、富于进取精神的、强调实事求是的人，变成了一个悲观绝望的、畏首畏尾的、屈从于暴力权威的人。

在仔细研读这批“思想情况汇报”材料后，我认为邓老身上体现出的前后矛盾，显然不是源自其自身性格的缺陷，而是政治高压和宣传误产的产物。所谓“政治高压”主要是指，虽然中共党章明确规定党内必须奉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然而在具体实践中，“民主”在很多情况下都必须服从于“集中”。虽然中央一再公开号召全党要“实事求是”，然而当下级和上级发生认识分歧时，“实事求是”原则往往成为“组织观念”的牺牲品。邓老曾在一份回报材料中摘录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试问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即使对运动有不同看法，邓老怎么敢违抗毛泽东的指示，担当“破坏党的统一”的罪责？

所谓“宣传误导”，主要是指在高度的舆论一律的情况下，许多真实情况都遭到屏蔽。人们在资讯严重匮乏、无法明辨是非的情况下，只能相信主流舆论的宣传。而且，从不撒谎的人当然不会轻易怀疑别人撒谎。从不搞阴谋诡计的人当然不可能知道别人搞阴谋诡计的种种伎俩。例如当时对刘少奇问题的调查和定性，是以中央名义进行并用中央文件的形式公布的。作为一个淳朴的、对党无限敬爱、无限信赖的共产党员，怎么会想到那些调查结论居然是建立在伪证基础上的恶意构陷？再例如，对江苏/南京一些军地干部和群众组织头头的点名批判，也都出自中央和地方主要领导人之口。而受到主流宣传支配的社会舆论，对此也都众口一词。被关在“牛棚”里的邓老们，哪里有可能去辨别其真伪呢？于是中央文件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邓老们就相信他是“叛徒、内奸、工贼”；上海《文汇报》等媒体说“陈（光）、包（厚昌）、张（志强）”是“常州事件”的幕后“黑手”，邓老们就相信“陈、包、张”是“黑手”；周恩来、康生在



1967年1月28日讲话中点了杜方平和高啸平的名，邓老们就觉得“杜、高”应该打倒；许世友在省、市革委会联席会议上点了“文（凤来）、张（建山）、朱（开地）、鲁（学智）”的名，邓老们就觉得“文、张、朱、鲁”应该批判；许世友的支持者们说“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史（景班）”和“江（腾蛟）、王（绍渊）、高（浩平）”等人“反许乱军”，邓老们就觉得这些军中败类应该清洗；单位里的“革命群众”说×××是“叛徒”、×××是“特务”、×××是“阶级异己分子”、×××是“漏网右派”，邓老们就觉得这些人应该被清理出阶级队伍……总而言之，在政治高压和宣传误导的情况下，除了服从，除了相信，除了紧跟，似乎没有其他选择。

从“思想情况汇报”看，在选择服从、相信、紧跟的过程中，邓老的内心并非没有矛盾与痛苦。例如，他在一份汇报材料中写道：“在如何参加揭发别人的问题上，思想上也有矛盾。一方面想到应该揭发；一方面又有顾虑，怕人家说我是想趁机来捞一根稻草。而且自己是有罪的人，能否允许我参加揭发及如何揭发，思想上也很犹疑。”另外，邓老似乎对“革命大批判”的本质并无深刻认知。他一直想对自己的各种“错误”深挖思想根源，希望在思想认识上有所提高。其实在文革和其他类似运动中，所谓“思想批判”的本质是“打态度”，是按照最高当局的个人意愿统一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言行。邓老在三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所作的，其实都是无用功。最终，他不是通过“独立思考”提高了认识，而是逐步将自己的思想纳入主流意识形态框架，通过认罪、赎罪来求得自我救赎。

纵观其一生，邓老在文革期间的种种表现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早年对共产主义革命学说和革命的道德观念的接纳，早就使得他具有了一种“原罪”意识。他的家庭出身问题，使他很容易认同自己是“阶级异己分子”；他早年的跨党经历，使他很容易认同自己是“历史反革命”；他在文革前长期担任部门领导工作，“把盲目服从上级指示作为组织观念，不论上级指示的对与不对，都要首先从组织观念上来服从”，使他很容易认同自己是“资反路线”执行者、“走资派”。上述“原罪”意识的存在，使他对群众批判和劳动改造毫无怨言，真心诚意地全盘接受。甚而至于，他还常常在这种责罚中感到某种内心的欢愉。由此可见，主流意识形态对邓老们的持续灌输是相当成功的，“群众专政”中的“打态度”策略也是成功的。不过他的另外一些表现又说明，他的善良本性并未彻底得到改变：他在“自省”和“自我改造”方面较为彻底，在揭发批判他人方面则有所保留。

在文革这样的全面失范的政治运动中，一个人的祸福根本无法预料。从某种意义上讲，邓老们在运动初期就被抛出来，是祸也是福。因为早早成为“死老虎”后，他们就有幸避免卷入此后的激烈派性斗争。与他们相比，有些在运动初期没有遭受重创、还有机会重新“站队”、“亮相”的人，下场似乎更惨。例如很多没有被公开打倒的省级和厅局级干部，在酝酿“大联合”的过程中就显得比较活跃，结果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当地的群众派性纠纷。站在“好派”一边的，因为在1967年春夏卷入“反许乱军”活动，在后来的“清队”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

被整得死去活来；站在“屁派”一边的，有些也未在清查“五一六”期间逃脱，有些则在粉碎“四人帮”后得到报应。而且，邓老们内心质朴、想法简单，始终真心诚意地认罪、伏罚，丝毫没有“翻案”的企图和动作。这客观上也有利于其自我保全。一方面，他们真心诚意地认罪、伏罚，使得那些直接施暴者得到很大的心理满足，不至于往死里整他们。另一方面，他们真心诚意地认罪、伏罚，似乎又为文革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提供了一个有利佐证，令策动这场运动的毛泽东感到些许安慰。因而在“全国山河一片红”以后，他老人家网开一面，使邓老们得以从“群众专政”魔掌下解脱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自由。

由于这批材料截止于1969年5月，我们无法知道邓老此后的思想变化。不过大量的其他材料显示，在政治高压和欺骗宣传下形成的“大一统”局面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到文革中后期，由于“林彪事件”和其他一系列重大变故的发生，关于毛泽东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种神话纷纷破灭，基于“个人超凡魅力”的极权政治面临重重危机，空洞无物的政治说教再也无法禁锢人们的思想。源于经验理性的各种“异端”思潮不断萌发、传播和蔓延，最终汇集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心理力量，在文革后期促成一系列反对文革的社会运动，并最终导致文革的终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从邓老的一贯言行看，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如果能够活到改革开放以后，一定会克服政治高压和宣传误导下形成的错误认知和性格扭曲，回复其乐观开朗的、积极进取的、实事求是的天性，加入那批“两头真”的“老革命”的行列。他的学术研究，也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上层楼。

2012/4/2

---

## 【文摘】

### 难忘的往事

（原载《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

张春亭

在当年“中央文革记者站”成立前后，我曾担任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情况的任务大约两年的时间。日子虽然不长，但所经历并值得追述的事情似还不少。时隔久远，虽然也查到了一些数据，但有些比较关键的数据却偏偏找不到了。然而有些事情的细节却依然记忆犹新，终身难忘。

#### 在“中央文革记者站”成立之前

我原是新华社军事部的记者，1966年春天作为一名新华社随军记者刚从援越抗美前线回到北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5月，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组织记者团，向中央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随后，我即被抽调参加了这一工作。开始，该团记者都是通过《人民日报》的内部刊物《情况汇编》向中央反映情况的。

3个多月后，我们所写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又改由《解放军报》

（简称《军报》）的内部刊物《快报》向中央反映。这中间，我们也曾到《军报》开过会，但在那个瞬息万变的年月，加之自身任务繁重，也很少去过问：为什么不通过《人民日报》向上反映？后来想想其实那时《人民日报》社内部的两派斗争业已非常激烈，社领导也在被批斗、靠边站。

至9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新华社受命，抽调新华社驻各军区、各军种记者集训，成立中央文革记者站，但对外却称解放军报记者站，记者皆持《解放军报》介绍信和记者证。但当时北京地区的稿件仍通过《解放军报》的《快报》向中央反映。而派往全国各地记者所写的稿件，则由新成立的记者站所出的《各地动态》向中央反映。那时，我尚不知道中央文革记者站设在什么地方，仍负责继续在北京采访，通过《快报》向上反映。这段时间我经历了两件事：

### 一、直接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当时批斗所谓“走资派”的情况。

这期间，我主要负责在北京各大专院校、国家科委、北京京剧团以及一些中学采访，及时反映了这些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文革”初期，各单位的主要领导人，包括各高校，甚至中小学的校长都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遭到了批判和斗争；各大专院校派系之间的斗争也非常激烈。有一次，北京各院校的“造反派”集中在北京航空学院的大操场开大会批斗北京林业学院的“反革命分子”李洪山。当李被押上主席台后，左右各有一人分别握住他的左右手腕，将他的胳膊从后边反方向推到头上，后边还有一个人揪着他的头发向后拉。如此坚持一刻钟，再换三个人，一上来又是一阵向前推、向后拉。然后再换三个人，又是一阵推、拉。最后只见被斗者的手臂全无血色，腿也软了。对此，当时常美其名曰“坐喷气式飞机”。我看了，心中不禁暗暗在想：“这也有点太残忍了吧？”但嘴上可不敢流露出来。而在一些中学里则更为荒唐和残酷，有些学生私设牢房，强迫“走资派”吃屎、吃头发；有的则将他们裤子扒下，用板子打屁股，要打出个“红腓”来；还要驱赶着他们像蛤蟆一样爬到池边去喝水，有的还逼迫被批斗者站在桌子上，低头弯腰，接受批判。那时，各种批斗的方式真可谓五花八门，不胜枚举。对此，我也向中央作过反映。有一次，我遵命到钓鱼台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情况时，还曾讲到上述情况，连陈伯达听了都“啊”的叫了一声，感到十分惊讶。然而，这种残酷的批判斗争当时并没有得到及时制止，以后愈演愈烈，发展成了打砸抢、武斗，乃至全国性的大动乱。

### 二、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在清华大学采访了正在被关押的蒯大富。

1966年7月7日，我到清华大学采访，听工作组搞宣传的同志讲到了工程化学系的学生蒯大富。“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蒯大富对北京市委驻清华工作组不满，贴出大字报要赶工作组下台。他给几所大学及其附属中学的造反派写信，提出赶走工作组，自己闹革命，夺取领导权。

有天晚上，我在清华园内看大字报，忽然发现其中一张标题特别醒目——《薄一波副总理怒斥反革命分子蒯大富》，所写内容是关于薄一波7月4日在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时当众斥责蒯大富的情况。因为那天我还没有到清华采访，所以便把

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抄了下来。其大概意思是说：薄一波走到大礼堂前，看了蒯大富给北师大女附中的信，正念到“脑子里想的是夺权……”，蒯大富忽然从人群中钻了出来。薄一波得知他就是蒯大富后，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说：“好啊，你来了。你脑子里想的是夺权，眼里看的是夺权，手里干的是夺权，你到底想干什么？”蒯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权问题……”薄问：“你要夺谁的权？……是谁在后面支持你？”蒯说：“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场同学大喊：“胡说！”薄说：“你这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最大侮辱！”（同学们高呼：“对！”并热烈鼓掌）薄一波又说：“蒯大富可能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至死不会承认错误。”但是，薄一波最后还是说：“你现在交待清楚，承认错误，还是有前途的。”……

抄完大字报，我当晚便写了一篇稿子，次日即通过《快报》向中央作了反映。以后我又摘录了其它大字报关于批判蒯大富“反对工作组”和“四出煽动夺权”的情况，陆续向中央作了反映。

没几天，毛主席便作了派记者采访蒯大富的指示。采访任务又落在了我的肩上，我当时还感到有些奇怪：怎么还让采访一个“反革命”呢？虽然心里是这么想，但嘴上可不敢说。那时蒯大富正被关在学校临时设立的“牢房”里。经有关领导同意，我访问了蒯，听取了他的陈述，最后还特意征求了他的意见和要求。此时，他当然更认为他的观点都是对的。事后我很快交了稿子，并通过《快报》反映上去。毛主席很快就作了释放蒯大富的批示，并让他出席了日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三千人大会。

那时的“文化大革命”可谓瞬息万变，令人难以捉摸。没多久，工作组下台了，各单位的领导人很多被打成了“走资派”（薄一波也成了“走资派”，也在被打倒之列），造反派纷纷起来夺权。这时的北京和全国一样，都处在一片混战之中。

以后，蒯大富便成了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造反派红极一时的领袖。我因为主要负责北京高校面上的采访，到其它学校跑的多，也很少有和蒯大富见面的机会。有一次，他见到了新华社国内部资深记者彭运南，竟对她说：“我要找你们的记者张春亭算账。因为他写内参称我是‘反革命分子’。”彭运南说：“当时学校的大字报不都是那么写的吗？你当时不是也被关押起来了吗？你可不要忘记，没有张春亭事后来采访你，并很快上报毛主席，毛主席也不会那么快批示解放你。让我说，你还应该感谢张春亭呢。”她这番话说得蒯大富一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此后，蒯大富再也没有找过我。后来碰到彭运南，她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我，我还真有点后怕，主要是怕蒯大富胡搅蛮缠，把我也给打成什么分子。

## 到“中央文革记者站”之后

1967年元旦，所有参与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情况的记者在《解放军报》社开会，晚8点又前往人民大会堂，接受周恩来总理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的接见。总理首先肯定了大家几个月来跑遍全国，向中央反映“文化大革命”情况所

取得的成绩，并向大家表示感谢。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都在会上讲了话。会后仅仅半个月，也即1月15日的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再次紧急召集记者开会，说明《解放军报》社的“文化大革命”也搞起来了，两派斗争非常激烈，原来在《军报》出版、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快报》停刊了。移交给“中央文革记者站”继续办理。所有的记者也都集中至钓鱼台附近住宿和办公。从这时起我便成了“中央文革记者站”的正式记者。

回想起来，在以后记者站的工作中发生了以下几件大事：

### 一、奉命前往天津找解学恭传递周总理11个字的口头指示。

在“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期间，我被任命为北京组学校组副组长，分工调查北京各大专院校的情况。时隔不久，我还执行了周恩来总理下达的一次紧急任务。那时，北京高校中成立了一个名为“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学生组织，其成员多为高干子弟，后被简称为“联动分子”。他们的行为显然与毛主席支持的打倒“走资派”的“革命造反”行动相违背。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也曾对“联动”提出批评，并指示他们放人。后来，“联动分子”又开始到天津活动。周总理便指示派记者前往天津向市委书记解学恭传达他的指示。其内容只有11个字，就是：“注意‘联动’动向，并采取措施。”总理还特别要求记者一定把这一指示记在脑子里，不要见诸文字，只能当面口头传达。

我奉命前往天津，脑中不时背诵着总理的口头指示，深为能执行总理下达的任务而感到荣幸。但是到了天津后，得知解学恭已被造反派扣留，他究竟被关押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通过新华社天津分社多方联系，也没有找到解学恭的下落。没有办法，我只好请示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经研究认为，即使找到解学恭，恐怕他也无法执行总理的指示，只好让我返回北京。当时，我人虽到北京但心中总以为没能圆满完成总理下达的任务而感到遗憾。

### 二、在河北邢台临西县东留善固村采访了正在被批斗的吕玉兰，使其很快获释。

1967年春耕春种的季节到来时，毛主席指示记者站派记者了解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我被指派参加这一工作。3月9日，我到了河北省邢台地区，先后在地委联合指挥部、生产革命委员会、农村文革办公室等单位采访了全区各县市“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还特地到邢台县马河公社深入实际了解农村第一线革命和生产的真实情况，并很快写成稿件，发回记者站。

3月11日在邢台地委学毛著办公室采访时，听说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吕玉兰正在被批斗。我又临时决定前往吕玉兰所在的临西县东留善固村采访。次日便到该村。不料，这里已有来自北京市和河北省十几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参与批斗吕玉兰的“革命”行动。得知这一情况后，我心内不禁微微打了一个寒颤。我暗自警告自己：“一定要听取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千万不要随意表态！否则，一旦被这些革命造反派揪住辫子，想脱身也脱不了了。”

经了解，原本身兼省贫协副主席、县委常委、公社书记和大队支书等多种职务的吕玉兰，这时正在本公社各大队被轮流批斗。当天上午，我便开始听取吕玉

兰所在大队文革委员会各位委员的意见，次日又听取了原大队干部和该村贫下中农代表的意见，而后又听取了部分大学生的意见。因为正在“文化大革命”的风头浪尖上，许多人有怕说了称赞吕玉兰的话而遭批斗的危险，所以大家所谈意见多为反面的上纲上线的意见，比如说吕玉兰如何弄虚作假，使用坏人，她的“劳动模范”、“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称号都是记者给她吹起来的等等。为了能听到正面的意见，我又个别访问了几户贫下中农，请他们讲真话，我保证不向红卫兵透露。他们才讲了吕玉兰的一些模范事迹和她为农民做的好事。最后我又壮着胆子到吕玉兰家中听取了她本人的意见和要求。只见她的堂屋内已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所有过去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镜框早已被砸碎了。她本人也哭诉了她天天被批斗和戴高帽子游街的遭遇。村里的许多人听说我此时此刻竟敢到吕玉兰家里访问她这个正在被批斗的“走资派”，都感到非常吃惊。有的说：“看样子，这个人来头可不小啊！”其实，我当时心里真一点数也没有。

采访匆匆结束，我即迅速返回北京，并很快写出稿件，上报中央。尽管我自己力争做到客观公正，反映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但心里还是捏着一把汗，生怕别人说我是替“走资派”说话，因而犯错误，受批判。以后听说周总理对此作了批示，给予了肯定。但我却未曾见过批文，心中仍不踏实。直到这年国庆节，从报上看到吕玉兰上了天安门观礼台的消息，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后来吕玉兰和新华社记者江山在新华社院内的8号楼结婚，我闻讯前去表示祝贺。我半开玩笑地问吕玉兰还认识我吗？她一时还有些懵懂。我提起1967年在她家访问她的情况，她一下恍然大悟，但却问我：“你不是《红旗》杂志的记者吗？”我说明了那时没有用新华社记者名义的原因。她接着讲了许多客气话，表示感谢我的“救命之恩”。我忙说：“不敢当！不敢当！我只是尽了一个记者应尽的责任。”不料若干年后，吕玉兰因病早逝。以后江山在为吕玉兰写传记时，还写了这一段经历。

### 三、“七·二〇”事件次日奉命飞赴武汉，进行采访。

1967年7月20日，武汉突然发生“百万雄师”围攻、扣留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政治事件，“中央文革记者站”驻武汉的记者也被扣押起来。记者站遵照周总理要求迅速派记者前往武汉采访的指示，立即决定派我和张广友、郭远发等同志，并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带领新华社两名报务员携带发报机，于次日乘机飞抵武汉。

前来机场迎接我们的是新华社湖北分社的同志。车进武昌市区，到处可见手持长矛、臂戴橙黄色袖章的“百万雄师”的队伍。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们的汽车穿过他们的人群时，他们还都鼓掌表示欢迎呢。

听新华社湖北分社的同志们讲，“百万雄师”对分社的记者还是比较信任的。说来也还满有意思：那时，“百万雄师”已完全控制武汉市的电信系统，新华分社发往总社的有关武汉“文化大革命”情况的稿件，都逃不过他们的检控。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防止“百万雄师”找茬闹事，分社记者所写稿件大都站在“百万雄师”的立场上说话；此间，分社还特意派出一位记者住在总社，待分社稿件

发到总社后，先由该同志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加以处理，再交总社编审交发稿。这在当时也是保密的，万万不可让“百万雄师”的人知道。就在我们到分社后，分社同志的警惕性依然很高。他们悄悄地指着分社对面的房子对我们说：“瞧！就在那个凉台上，经常有人站在那里窥探我们，你们来了也不能不有所防备。”到了晚上，分社的同志还特地领我们到另外比较秘密的地方住宿，并用我们自己带的发报机向总社发稿。为了更安全起见，分社又干脆安排我们到武汉空军招待所住宿，直至我们返京为止。

刚到武汉采访，还真有一点出生入死的味道。次日我到湖北大学采访，适逢“百万雄师”攻打湖大。只见他们用推土机把该校的院墙推倒一个大缺口，接着便是“百万雄师”的队伍手持长矛，潮水般涌入校园，喊着叫着追赶湖大的学生。我恰好也在被追赶的人群之中。跑了一段距离后，已退到“军宣队”在湖大办公的地方。多亏“军宣队”的同志闻讯出来紧急制止“百万雄师”的野蛮行为，大家才幸免于难。我向“军宣队”出示证件说明情况后，当即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与北京通了电话，发了一条短讯。不料我的低血糖病发作，晕倒在桌旁。“军宣队”的同志们迅速找来医生，为我注射了葡萄糖液，我才慢慢缓了过来。

不几天，中央电台即广播了中央否定“百万雄师”的消息，我和分社的一位记者还专程到“百万雄师”总部观察了他们撤离的情况，并随访了他们执行中央命令的态度。听说我们是新华社记者，他们的态度还都比较友好。但大多有抵触情绪，想不通为什么要解散他们，并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向中央反映。

在武汉采访近一个月，我们跑遍了工厂、部队、公安、学校、艺术团体等许多单位的群众组织，向“中央文革记者站”发送了30多篇稿件，其中有些情况也曾引起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视。比如8月2日，我们曾向“中央文革记者站”发过一篇“武汉公安联司”（“武汉公安系统联合司令部”的简称，也即公安系统与“百万雄师”相对立的一派群众组织的名称）所作的关于“行使公安职能，发挥专政作用”的八条措施，包括抓捕、审讯“百万雄师”总部及其各大单位的头头以及“七·二〇事件”的幕后组织指挥者等。8月5日，周总理就在电话上对武汉军区“支左”部队负责人作出指示，其内容大意是：抓人的事情要刹车，已抓的人，能放的就放。这是个策略问题。现在有十个省的问题要解决，武汉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影响全国。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有统一部署，不抓人，就是毛主席的指示。

随后，我们又相继反映了“武汉公安联司”对毛主席指示想不通，并继续抓人、审讯以及“百万雄师”一些组织继续散发传单、抢枪、开枪伤人、武斗、游行等情况。

就这样，我们在武汉紧张地调查、采访了二十多天。从武汉返回北京后，我仍然在北京组学校组，负责了解北京各大专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1968年4月，我因两地分居的爱人生病而请假赴兰州探亲，假期届满返回北京后，因“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任务减少，主动提出不必回记者站，返回原单位工作。从此之后我回到了新华社军事部，离开了中央文革记者站。

本文作者离开记者站后任新华社解放军总分社负责国防、外事报道的编辑、记者；后转为军籍，为正团职记者、编辑；后任新华社《瞭望》周刊文教组副组长、涉外版总编室主任、周刊编委，周刊驻港办事处主任、周刊政治编辑室主编。被评为高级编辑。

【文摘】

## 西藏文革二三事

（原载《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

肖健卿

1967年10月至1968年2月期间，我曾以《红旗》杂志记者的身份，被派往称为神奇之地的西藏首府拉萨，了解当地文革进展的情况，先后目睹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往事。

### 拉萨两大派陡然之间都成为“革命群众组织”

西藏自治区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因交通不便，信息相对较为迟缓，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也远远落后于内地。时至1967年10月，全国已相继有八、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委会，而西藏首府拉萨，尚处于两大造反派组织鼎足相立，势均力敌的局面。（右图：作者当年在拉萨。）

回顾这两大派的状况，一派名为“大联指”（拉萨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主要是由自治区党、政机关的造反组织为核心组建而成的，下属组织多为各级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群众组织，也有一部分藏族群众组织的组织加入。他们与上层和支左部队的关系密切，活动能量较大，但造反精神略显不足；而另一派，名为“造总”（拉萨造反派总司令部），是以汽车运输公司等单位的工人造反组织为核心组建而成的，下属组织多为汽车运输、建筑行业的工人和街道藏族群众组织的群众组织。他们与广大汉、藏工人和基层藏族群众联系较广，有一定威望，普遍认为造反精神强于“大联指”。对在拉萨涌现出的这两大派，社会各个方面通过对他们在运动中的表现，产生出一些截然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他们一“革”一“保”，“造总”是造反派，而“大联指”是保守派。外地串连到拉萨的红卫兵，也多持此种看法，并由此与支左部队人员常发生争辩与冲突；有的又认为他们是一“革”





一“坏”，“大联指”是名副其实的“革命派”，而“造总”则是混进有不少坏人的“不纯组织”，应该进行清理和整顿；两大派之间，则互相揭短，彼此攻击，“造总”指责“大联指”是“典型的保皇派”，而“大联指”则指责“造总”是打着造反旗号的“坏组织”。面对如此众说纷纭的状况，部队介入支左以后，并未能及时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正确认识两大派各自的优长和不足，多从团结、联合上做工作，而占主导地位的多数，明显地倾向和支持“大联指”，而对“造总”则进行压制和疏远。由此，也使两大派群众组织对部队的支左工作，产生出有褒有贬的不同态度，“造总”还由此与支左部队之间发生过一些大小磨擦和冲突。

运动发展至1967年7、8月间，西藏军区已逐步认识到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问题，正起草报告报请中央，承认自己在支左工作中犯有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以缓和与“造总”之间的关系，恰在此时，毛主席视察祖国大江南北，作出了一些重要指示，中央领导于1967年9月，及时接见了赴北京开会的西藏党、政、军的领导干部，明确提出，遵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西藏拉萨的两大派，都应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领导要多做教育和帮助的工作，促进双方大联合。中央的指示可说是及时雨，澄清了当时的众说纷纭，统一了社会各界和支左部队对待两大派的看法和态度。

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是陡然之间发生的，在两大派、支左部队和“当权派”中，过去存在的一些偏见和认识还来不及纠正，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还需时间进行调整，从而表现出，原先旧有的一些矛盾似乎已趋向缓和，但即将产生的一些新的矛盾，又正在显现和形成。在这之后，西藏军区未再进一步着重纠正以前支左工作中支一派压一派的某些错误做法，“大联指”则很看重中央对自己组织性质的“正名”，“造总”则处于极不理解、极不服气、对支左部队仍存有一定戒心的对立状态。我就正是在出现这一转折的新形势下，被派前往拉萨进行采访活动的。

这时，拉萨的两大派，已旗鼓相当，难分上下，各自都在拉萨城区占据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控制地区。“大联指”总部设在城北西藏自治区党委大院，附近一带党、政机关、单位也就成为他们势力控制范围；而“造总”的总部设在布达拉宫下的一所藏式建筑的总工会大院内，下属组织主要分布城东岳王山一带，因而这些地区也就成为了他们的势力控制范围。而拉萨城中心区老街、大昭寺、八角街一带，是双方都可以自由活动的“游击区”，两大派宣传不同观点的大标语，在这里到处可见，也各自不时在这里的广场上召开大会，老城区似乎又成为了当时两大派都可占据的真空地带。

我到达拉萨之后，两大派总部都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友好姿态，各自都在大街上刷出大标语：“欢迎《红旗》记者到拉萨采访、视察！”遵照中央的指示，两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促进大联合的精神，我在采访活动中，特别注意严格遵循“不偏不倚”的做法，相应的活动都以两方对等的方式进行，今天到这一派总部了解情况，明天便去另一派总部，坚持遵守“不表态”、“不干预”的信条，对两大派邀请参加的会议，都尽量抽时间去参加，避免使任何一方产生记者有意疏

远的疑虑。

当时，我在西藏军区第一招待所的住所，既是宿舍，也是办公室，一架红色保密电话机就设在写字台上，向北京发稿，主要就是在深夜使用保密电话。起初，我并未留意，无形中发现，有一次在发稿时，听到门外有轻轻移动的脚步声。这个信号引起我的警觉。新来的《红旗》记者，对待两大派的想法如何，必然是当时两大派急需了解的“重要情报”。面对如此处境，我不得不提高警惕，在深夜发稿时，用一件军用大衣（或棉被），严严实实地将头和保密电话机盖上，借用手电光照明。采取如此“安全”措施，才释却了当时担惊受怕的心情。由此，也可看出当时两大派严重对立状态的一斑。

### 自治区第一副主席在拉萨突然失踪

我经过深入了解拉萨地区两大派的情况，发现其中一个最大的分歧点，就是对待西藏自治区第一副主席（相当于副省长）周仁山的态度截然相反，一个坚决要“打”，一个坚决要“保”，成为当时两大派激烈争辩的主要焦点之一。“大联指”要打倒周仁山，说他历史上是叛徒，现实的问题是在西藏执行了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有许多“三反”言行；而“造总”坚决要保周仁山，说他历史上有问题是无根据的诬告，在西藏十多年的工作是经受得起检验的，与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还曾有过斗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他就旗帜鲜明、态度明朗地一再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造反行动，反对军队支左后亲一派疏一派的做法。两大派的这种大相径庭的态度，不仅反映在张贴街头的大字报上，而且还在各自出版的小报上，大篇幅地刊载不同观点的文章和材料。“大联指”发表“一论打倒周仁山”、“二论打倒周仁山”；“造总”就针锋相对，“一论保护周仁山”、“二论保护周仁山”。争辩之间，互相逐渐进行讽刺、攻击，字里行间迸发出浓烈的火药味。从观点的分歧、文字的攻击，进而发展到对周仁山本身的争夺。“大联指”发出布告，勒令周仁山何日何时到会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交代自己的“三反”罪行；“造总”闻讯，立刻发出邀请，欢迎周仁山何日何时到会，与革命群众共商搞好西藏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问题。

两派都已明确是革命群众组织，弄得周仁山无所适从，只好一时到会接受批斗，一时又到会接受欢迎。在两派争夺到一定时候之后，“造总”采取了断然的措施，将周仁山接到总部，住宿在一个秘密的住所，对此，“大联指”当然立即作出反应，上纲上线，指责“造总”不讲革命原则，居然保护“走资派”周仁山，堕落到与“走资派”同流合污的地步。

我曾破例地被允许在“造总”总部采访了周仁山。看到他受到“造总”礼遇的热情款待。每日三餐专门分工有人安排，饭菜送上房，茶水端上手，有人负责警卫和生活照顾。住在这里，少却了“大联指”的纠缠，倒也心安理得。周仁山谈起“大联指”对他的批判，异常气愤，他说：“当年我赴内蒙古地区，做塔王的团结争取工作，是中央委派的，事后情况也及时向中央报告，以前对这段历史也经过审查，情况是很清楚的；现在，怎么又钻出一个我是叛徒出卖的问题呢？”

对西藏地区的工作，他觉得他与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团结共事，大家都是很努力的，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也应该是有目共睹的，现在不能把西藏地区所有的过失，都不分当时客观的条件，一古脑地记在我周仁山一人身上。

我向他提问：“周主席，外面对你离开自治区政府，住宿‘造总’总部说法很多，你对此事又有何看法？”

周仁山笑一笑，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说：“造反派的意愿我不能完全违背，否则，我真无法度日！”

周仁山住宿“造总”总部一连十多天，“大联指”的攻击没有发生任何效用，他们也酝酿着采取断然行动，上门把周仁山抢夺出来。拉萨支左办公室闻讯，立即前往两派做工作，希望“造总”不要再挽留周仁山，尽快把他送回自治区政府，同时也向“大联指”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兴师动众，前往“造总”总部抢夺周仁山，以致发生不必要冲突，酿成武斗。

不料，事不过一二日，“造总”突然间向外公开宣布，周仁山已离开总部，不知去向。同时，还欢迎支左办公室派人到总部搜查。周仁山到何处去了呢？自治区第一副主席一夜之间突然失踪，上下震惊，西藏军区向中央发电报告情况，当时滞留在成都军区办事的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本刊注：此说不准确，张国华已于1967年5月被中央任命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发电告之在家坚持工作的西藏军区政委任荣，嘱他一定要想法尽快找到周仁山。

周仁山如此失踪，“大联指”对“造总”指责的言词更为激烈，说“造总”在周仁山问题上越走越远，已滑到了“保皇派”的边沿，如果再不交出周仁山的下落，找回周仁山，将无法弥补自己的过失，取信于西藏百万农奴。

周仁山突然失踪的消息，经过群众组织自办小报的传播，一时成为全自治区的头条新闻，逐渐家喻户晓。支左部队派人四处寻找，都一时未知道周仁山的下落，判断可能已远离拉萨，逃躲他乡。

就在这四处找寻、下落不明之时，西藏军区突然接到张国华经成都军区发来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是主发中央，同时抄送西藏军区的。我看到，电报以简短的文字告之，成都军区接兰州军区来电告诉，周仁山已在青海某县农村找到，准备派人“护送”到成都军区。张国华在电文的最后明确表示，周仁山的行为是错误的，请示中央同意，由成都军区派人“护送”回拉萨。

此消息不胫而走，传向社会。事后得知，周仁山在“造总”总部再无法继续住宿下去之后，由“造总”成员、拉萨汽车运输公司一名驾驶员，驾车将他送到家乡青海某县农村藏匿。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周仁山就被当地民兵发现，报告给上级武装部门，然后逐级报告至青海省军区、兰州军区。兰州军区接到报告，觉得事关重大，周仁山住宿在农村无人保护，万一发生意外不好办，便立即派人到农村，动员那位驾驶员交出周仁山，护送到兰州军区，并立即将情况电告成都军区。尔后，派出两名干部和两名战士，全副武装，乘火车将周仁山安全“护送”到了成都。

周仁山到达成都后，张国华经请示中央同意，由入川支左不久的某军，派出一名干部和一名战士，乘飞机，将周仁山“护送”回拉萨。

到达拉萨的那天，西藏军区已事先接到通知，下达命令要拉萨警备区做好“迎接”的工作，要绝对保守秘密，因拉萨贡嘎机场至拉萨城区还有 100 多公里的路程，几乎与成都至拉萨乘坐飞机的时间相等，万一在路途中发生意外，事情就很难办了。拉萨警备区在接受任务后，除做好保密工作之外，还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他们派出了 13 辆汽车，在前后各 6 辆大卡车上，隐蔽地坐着全副武装的战士，“护送”中间的第 7 辆小卧车，周仁山下飞机之后，就被安排坐在这辆小卧车上。“迎接”周仁山的车队，一路平安地驶达拉萨城区，然后直接驶向西藏自治区区工委所在地，周仁山就暂时住宿在这里。

周仁山到达拉萨不几日，我特地前往采访，见他的住地有警备区派出的武装人员严密守卫，这是西藏军区防备他返回拉萨后发生意外而采取的“保护”措施。我的采访活动是事先得到西藏军区领导的批准，然后经过警备区通知看守的部队，才一路开放绿灯，顺利地到达周仁山住地，与他进行交谈的。这时的周仁山，受到部队武装人员的“保护”，不再担心被造反派揪斗，心情反而比较安定。在他住地，仍然像在自治区副主席的办公室一般，热情地接待了记者，让记者坐在客厅，由警卫人员沏上热气腾腾的香茶。我问他此行的感想，他似乎不好意思地莞尔一笑，然后回答说：“作为自治区的领导，未经请示中央和征得自治区党委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就私自外出到青海农村，这种做法的确是不妥当的。但是，也不能不考虑现在是开展运动期间的这个特殊情况。我住宿在‘造总’总部，也是身不由己啊！听说两派为争夺我，可能会发生武斗，造成无谓的伤亡，左思右想，还是暂时离开拉萨躲避一下，或许还是一个上策，因此也就同意‘造总’那么做了。要说有错，不在‘造总’，而在于我。”

尽管周仁山强调客观作出解释，但他私自逃奔青海躲避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擅离职守的性质，“大联指”上纲上线说，这“好比战士在战场上临阵逃脱”。声言“看他今日的逃跑，就知他昔日的叛变”，“警告周仁山妄想蒙混过关”。

“造总”虽然对将周仁山被“护送”回拉萨的做法不作任何辩护，但对周仁山的态度，仍然不放弃原有的看法，认为他还是革命领导干部，应该加以保护，不能一逼再逼，将他推向对立面。

事后，我有幸与从成都“护送”周仁山回拉萨的成都军区的干部、战士一同游布达拉宫，谈起这次特殊的“任务”，这位干部说：“从兰州军区送周仁山到成都，然后由成都送至拉萨，领导上一再强调要做好保密工作，生怕在路途中发生意外。我们虽然身带有武器，但不外露，名义上还只是‘护送’。周仁山对青海之行，虽也认为有些不妥，但总还认为是身不由己，不得已而为之。”

### 两派对立趋严重酿成军内外发生武斗

西藏军区原属一级大军区，机关开展“四大”时也曾组建有群众组织，观点倾向、支持“大联指”的组织是多数派，观点倾向、支持“造总”的组织是少数

派。1968年元旦，在军区大院就发生了一起多数派对少数派的聚众斗殴事件。

那天，天气阴沉，气温在零下十多度，站在室外两手发僵，耳朵像有针扎一般。上午10点左右，在军区大院广场上突然聚集了数百名干部、战士。我闻讯后，迅速赶赴广场，听说是部队警卫营倾向“大联指”观点的干部、战士，因门卫纠查，与西藏军区文工团倾向“造总”观点的团员发生磨擦，以致酿成了武斗。

军区广场上的混乱，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钟才逐渐平息下来，被打伤的文工团员当场被送往门诊部检查就医。事后，警卫营虽然进行了严肃的整顿，动手殴打不同观点的文工团员的基层干部、战士，分别受到了纪律处分，但这次事件却给人们在心中留下了一片混乱和恐慌！难以想象，在军区大院都缺少应有的“安全感”了！

西藏军区大院的武斗气氛，与西藏社会上武斗的升级互为影响，逐日增高。拉萨两大派组织在武斗中运用真枪实弹虽然比内地的时间要晚一些，但时至1968年春节期期间，也就已有少数群众组织在武斗中开始运用步枪、土制手榴弹和炸药包。然而，这里是藏族聚居之地，武斗从短兵相接，发展到互为对峙之后，使用的“远程武器”，却有其别具一格的特色，就是用牦牛毛编织的一根鞭绳，裹着一块鹅卵石，在头顶飞旋到一定速度后，猛一松开一端鞭绳，让鹅卵石飞抛击中目标，俗称它是“飞石”。这种“飞石”，原本是藏族同胞牧放牛羊时，驱赶牲畜时使用的工具，飞抛离手的那一瞬间，还带有“啪、啪”脆响的声音，日积月累的磨练，使飞石者能做到准确地击中近百米之外的目标。

在春节前的一天里，我亲历了这样一次两派“飞石”对阵的场面。

那天，我骑着自行车，赶到“造总”总部采访，刚把车放好，“造总”总部的一名勤务员急忙走出门来，拉着我边走边说：“快，快，同我们一起坐车去拉萨水泥厂，那里昨夜遭‘大联指’伏击了！”不容我犹豫，就被这位勤务员拉着拥上了一辆北京吉普车。

水泥厂离拉萨城区十余公里，位于拉萨城区至贡嘎飞机场的要道上，原为“造总”控制的据点。昨晚，“大联指”经过策划，趁黑夜进行了袭击，夺取了公路右侧的少部分厂房，而公路左侧的工厂主楼还被“造总”占领着，“大联指”为扩大战果，至第二天仍在全力进行攻击。

谁料，记者一行乘车驶至工厂时，两派武斗还在激烈地进行。车刚驶进工厂大门，一阵“飞石”便如雨点般飘落车后，有经验的驾驶员惊叫一声：“不好，他们发现我们啦！”他猛踩油门，汽车向前急驶，紧贴墙壁，利用楼房作掩护，左弯右拐地急停在背靠对方的一座平房边，不一会，只听到一阵“砰、砰！”“嘭、嘭！”的声音，平房屋顶上被砸下无数“飞石”，汽车前后无楼房遮掩的暴露地段，也滚落下数十个拳头般大的鹅卵石，我们不禁面面相觑，伸出舌头惊呼：“好悬！”

我依托楼房的墙壁，在拐弯处伸出头探望，见工厂的楼房顶上，站满了黑鸦鸦的一片人，个个头戴柳条帽，有的正抡动着手中的牦牛鞭，将“飞石”向对方据守的楼房抛去。看得出两派正在以楼房为掩体，展开“飞石”的激烈对攻，不时还听到被“飞石”击碎玻璃窗户的“哗啦啦”声。

拉着我前来的那位“造总”的勤务员，悄声告诉我，这里进驻有一排支左的解放军，就住宿在旁边那排平房里。但是，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观点倾向“大联指”，因此，对“大联指”发起的进攻，虽也曾出面做工作，进行劝阻，但基本上是睁一只闭一只眼。我听到此话，暗想自己这时来到工厂，处境十分不利。如“造总”占领地区被“大联指”攻破，记者也会跟随着“被俘虏”，到那时，也就会引起“大联指”猜疑，制造出记者是“造总”幕后支持者的流言，为今后记者开展工作带来许多困难。我如此盘算之后，便决定冒险冲过两楼间的空地，到部队住地去躲避。

随着我飞跑冲进部队的住房，只听到“啪、啪、啪”的声音特别响亮，一阵“飞石”频频地砸在钉有木板的窗户上，有如击鼓一般。室内的窗户因被木板挡严，显得光线暗淡，战士们有的开亮电灯，为端坐在条凳上的人理发，有的埋头在灯下看书写信，好像不知屋外正在发生武斗。记者了解到，部队的同志并不像那位“造总”勤务员所说的，在一旁袖手旁观，而是从昨晚起，排长便带领人员，在“大联指”那边做工作，今天凌晨，他又带人赶到那边去了。不一会，耳听“嘭”的一声，一块“飞石”又重重地砸在遮挡窗户的木板上，我很觉好笑，便向战士们问道：“外面武斗这么厉害，石头砸在窗户上啪啪发响，你们连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吗？”战士们笑笑说：“这时经常发生武斗，我们已习惯了。”

武斗持续到上午10时多，经过支左部队的同志反复劝说，双方对峙的局面才逐渐缓和下来。这次夜以继日的远程对战，以“造总”丢失公路右侧少数厂房“据点”而告终，双方只有少数人员负轻伤。事后得知，拉萨水泥厂因地处拉萨至机场的要冲地段，双方争夺一直很厉害。这次武斗之后，“大联指”与“造总”所设的“据点”，一路之隔，遥遥相对，时时发生磨擦，双方来往公路的车辆，也时时遭受对方人员的袭击，有时又由此爆发出一场“飞石”对阵。武斗发展到以后大规模动用真枪实弹，这里仍然是两大派争夺的重点。

### 周仁山再爆惊人之举——冒名顶替上北京

1968年2月中旬，中央决定西藏两大派组织，党、政领导干部和军区派出代表赴北京学习，并趁机汇报解决西藏问题。北京记者站领导电话告之驻藏记者，随同西藏地区赴京人员，乘专机一同返回北京。

因为连续几日天气不佳，专机多次推迟起飞，迟至2月21日，天气稍有好转，我才随同西藏派出的赴京代表，于凌晨登机离开拉萨。

这次赴北京的代表，两大派组织和倾向于两大派观点的领导干部的人数、名单，都是经过支左部队、自治区区工委反复研究，并又同两派磋商之后才确定下来的，基本上处于对等状态。军区在家主持支左工作的政委任荣也一同随机前往。

起飞那天，天空布满了一层薄薄的白云，空旷的机场上，凉风飕飕，遮绒帽放下护耳，下端的小绳被吹得四处乱晃，鼻子尖直冻得发麻。临上飞机时，任政委的程秘书，奉命站在舷梯的右边，手拿着花名册，逐一清点、辨认登机的人员。他要求我“帮帮忙”，站在舷梯的右边，维持一下秩序，以免发生漏点、漏查而

登上飞机的。他办事十分认真，如发现有人拥挤着上飞机，就立即把他们拉开，保持一定的距离，嘴里不停地招呼：“慢一点，不要忙！”登机的人员一一被点名、清查之后，登上了飞机，没有发现一个不到的人员，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差错，都是按照事先分配的名额、应到的人员登上了飞机。不一会，舷梯收走了，飞机徐徐起飞了。

我登上飞机之后，与任荣政委、程秘书等同坐在飞机前部的头等舱里。飞机升空，穿行在弥漫的白云之中，由于强大的气流的冲击，一会儿向上抛，一会儿又向下落。任政委谈起这次北京之行，语气平和地对我说：

“这次派代表去北京，‘造总’坚持提出非要周仁山去不可，周仁山本人也有这个要求。但我们考虑，他如去了北京，两派代表又怎能坐在一起学习，肯定会引出不少麻烦来！所以，我们认为，还是不去为好！”

周仁山仍处于两派激烈争夺的地位，一革一保，矛盾异常尖锐，目前不去北京参加学习、汇报情况，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表示同意地重复说：“我看也还是不去的为好！”

谁料就在交谈这件事不到十多分钟后，程秘书突然神情紧张地从后舱走过来，向任政委报告：

“政委，真没有想到，周仁山冒名顶替某某，穿着一件皮大衣，放下遮绒帽的护耳，戴一个大口罩，蒙混过关登上了飞机！”

任政委一听到这一消息，啊的一声半天合不拢嘴。我也很诧异：“上飞机时，不是一个一个点名、清查了，这怎么可能呢？”

“这是真的，我刚听说也不相信，特地到后舱，见到了周仁山才来报告的！”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仍不大相信这一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便立即起身，前往代表们乘坐的后舱查看，果真是如此！这时的周仁山，已脱下大衣，摘下遮绒帽和口罩，远远地一眼便能认出。他正笑容满面地与邻坐四周“造总”组织的代表交谈。他见我到来连忙欠起身子握手，微笑点头。

我返回前舱，告之政委：“周仁山真的上了飞机，是冒名顶替另一个干部的名额。”

任政委严肃地说道：“这周仁山前次潜逃到青海，这次又冒名顶替上北京，真是太不遵守纪律了。”

飞机凌空飞翔，又不能像坐汽车一般，随时可以停车下人，这时任政委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说：“现在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只有到达成都以后再说。”

飞机降落成都机场之后，在候机楼里，任荣政委让秘书将周仁山请来，当面说道：“周仁山，你这次冒名顶替，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怎么能一再二地这么做，把自己紧紧地与一派伙在一起！……”

周仁山不等任政委说完，抢先争辩：

“这有多大的错误？到北京去学习、汇报情况，我应该有这个权利！我担心有人从中作梗，歪曲汇报我的情况，我所以想能有机会直接向中央呈述！”

“你的要求，我们可以向中央反映，由中央作出决定，在未经请示中央同意

之前，你怎么能采取这种做法？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太有些出格了。你现在正在接受组织的审查，群众的揭发、批判，怎么能妄自行动，乔装打扮去北京呢？！”

“我觉得对我的揭发、批判，有许多是不实之词，‘大联指’这一派对待我的态度也很不公平，我有许多意见，在拉萨无处诉说，正想能有机会到北京去申诉……”

任荣政委打断他的话说：“不要再说了，我就在机场向北京请示，如果中央不同意你去北京，你就留下，改乘飞机回拉萨！”

任荣政委在机场经军用电话线路要通了中央办公厅，对方经请示周总理回答：“既然事已如此，就让周仁山随机到北京来参加学习。”听到如此决定，任荣政委挥手对秘书说：“你去告诉周仁山，中央已同意他去北京！”

周仁山高兴了，“造总”的代表在候机楼欣然相告，“大联指”的代表听到这个决定后，对任荣政委提出强烈抗议，表示对周仁山去北京参加学习的行动“保留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是“周仁山犯下的新罪行”，今后要联系他所有的“三反”言行，一起彻底清算。

事情果不出所料，周仁山到达北京西藏地区学习班后，成为了两大派争辩的焦点。这一派要召开大会揭发、批判他，而另一派又提出抗议，要求予以保护。乱得学习班的领导无法驾驭，只好向中央请示办法。中央指示，暂时将周仁山“隔离”审查，接受群众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两派白热化相争的局面暂时平息下来，但分歧的意见仍然存在，继续在大字报上展开激烈的“派战”。

事情发展到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与新疆自治区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委会的最后同时成立革委会，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中，将周仁山点名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西藏的代理人”而打倒了，“大联指”的观点取得了胜利，“造总”在保周仁山上的所作所为，成为了他们一时“斗私批修”、清除派性的一个重要内容。

文革结束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周仁山被彻底平反，恢复了职务，并在新疆自治区担任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此文原发表于《西藏党史资料》2007年1、2期。

---

【文摘】

## 口述史的魅力在细节

### ——由“老舍之死”谈文革口述史

王 炎

“老舍之死”是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在知识分子与文艺界中引起过巨大的震



撼。然而“老舍之死”的历史真相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烟云缭绕，至今扑朔迷离，莫衷一是。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官方与民间、海内与海外的出版物已经不少，但真正有深度、有理论、令人满意的大部头并不多。推究起来，一是由几大“熟知事件”堆砌，依样画葫芦、“偷工减料”的多，二是由《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理论定性到具体的史实研究，推动起来常常脱节，显现出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人们并不满意已有的“解释”，普遍期待对若干问题具体细节的正确“解读”，这从《炎黄春秋》与报刊文摘的热销中可以看出。文革口述史的工作悄然冒出了墙头。

到目前为止，文革口述史的工作相对要好一些，已经取得了部分成绩，挽救了很多“活”史料，拓宽了资料搜集的范围，写作过程也比较严谨。但是，这项工作仍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实践与理论相对脱节，例如名实不符、视角单一、缺乏研究意识等等，需要认真加以总结、提高。（王宇英《文革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从事文革口述史有其特殊的困难度。在动乱年代，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做了与道德标准相悖的事情，虽然事过多年，一些口述者仍不能或不愿坦诚面对当时自己的错误作为，加之人们在感情体验上更容易记住被害而不是加害的经历，所以难免产生偏离史实、回忆失真之类问题。这就需要训练有素的研究者在扎实的专业素养基础上，运用成熟的口述史研究技巧，小心谨慎地加以判断、规避、提醒、引导和纠正。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邓小平曾经说过：“宜粗不宜细”。那是对党史部门处理这个敏感题材的总体策略而言，因为越细越复杂，现阶段研究不充分，容易出问题，写得过细过重，将来难免被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口述史研究而言，却是十分需要细节的。由于它的性质是研究探索，是留史存真，它的魅力恰恰就在于细节方面，不细反而不能说明问题。

我们来看看最著名的口述史难题——“老舍之死”。

1966年8月24日，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位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这就是作家老舍，他投太平湖死了。

40多年前老舍纵身一跳的太平湖早已被填平，老舍在跳湖自杀后的第12年也已获得平反，但关于老舍之死、关于谁打捞了老舍的尸体，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从一九九三年至今，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对“老舍之死”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追踪采访（口述史采访），有趣的是，在“谁打捞了老舍尸体”这一环节上，前后出现了三位自己并不认识老舍却又自称自己才是惟一打捞者的“历史见证人”。

问题复杂化了。

傅光明自己说：“其实开始的时候动机特别简单，就是想事情过去了将近30年，通过寻访1966年的历史当事人，把当年的历史现场做一个尽可能逼真的还原。”没想到，三位证人都说老舍尸体是他们在渔场渔民的帮助下独自打捞的，

但他们却是在同一时间（1966年8月24日清晨）和同一地点（太平湖）打捞上同一个人（老舍）。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其中必有二人作了伪证。他说：“相互矛盾的叙述反而使我们手足无措，有时甚至是瞠目结舌，并不遥远的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显然，事隔多年，人们已经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编排、过滤了历史。”（郑实，傅光明《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4页）这段话大体是不错的。

因此，有人得出结论：历史并不能真正“还原”，口述历史并不可靠。

问题真有那么严峻吗？我以为不然。我认为只要有足够的细节存在，就有助于研究和判断，就可以帮助口述史成立，并藉此理解、恢复与重建现场情景（也可以称为“还原历史”），这就是口述史的魅力所在。

傅先生夫妇所作的三次口述史访谈如下：

口述者之一：原北京北太平庄派出所民警郝希如先生

采写：傅光明、郑实

时间、地点：2000年12月23日郝希如先生家

口述者之二：原北京市汽车修理总厂第四修理厂工人白鹤群先生

采写：傅光明、郑实

时间、地点：2001年11月19日白鹤群家

口述者之三：北京颐和园派出所退休民警朱军先生

采写：傅光明、郑实

时间、地点：2002年6月20日下午颐和园派出所会客室

三次口述史访谈的内容都不长，有效信息量并不多，各自仅有千余字，可以说有相当的局限与难度，但其中的细节很有用。让我们试着分析其中的一些细节情况。

第一位郝希如先生是请朋友帮忙打听到的原北京北太平庄派出所民警，采访他的访谈发表，并经发行量很大的《作家文摘》转载以后，第三位证人朱军先生找到《作家文摘》编辑部来，说他才是真正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并主动留下联系电话。巧的是他还与第一位打捞者当时同在北太平庄派出所工作。

这两位叙述者当时不仅同在北太平庄派出所工作，而且彼此的叙述有相互“重叠”的内容：1、老舍死后，北太平庄派出所民警到过太平湖现场；2、对于老舍之死，当时北太平庄派出所作过登记记录；3、太平湖自杀现场散落有老舍手稿；4、老舍夫人胡洁青后来到现场认了尸。根据常识判断，这四点大致不错，尽管当时的现场面貌已经不复存在，但现场情景仍然大致复原出来了。

第二位白鹤群先生却完全没有涉及以上四点，显得有悖逻辑常理。他的访谈记录说：“我看见有人说是他捞的老舍尸体，我说是我捞的。一共是三个人捞的，另外两个人的姓名我都可以告诉你们。第一个站在岸边的是绰号叫麻子李三的，他是柳和居的掌柜；第二个是铜厂李棋王，因为他们老去，我们都认识，但不知道叫什么；第三个是唐浩澜，我就是通过他知道死者是老舍的。”但当问他“就

是说捞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是谁”时，他说：“对。惟独唐浩澜知道。当天9点钟，他就告诉我消息了，他来我们家告诉的我。”

据白鹤群先生说，捞完老舍尸体，7点钟他就回家了。而唐浩澜是故宫博物院的金石鉴定家，之所以认识老舍，是因为他爱人王学敏是张大千的学生，和老舍是亲戚。这就更奇怪了，自己的亲戚突然死了，当时就该通知亲属和报派出所。当时不指认，过几个小时又专门跑去告诉一个于料理后事几乎毫不相干的“非亲戚”、“非民警”，未免太自夸了。就像现在演的科幻电影《盗梦空间》一样，白先生完全可能是一种记忆误植，他捞的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因为1966年在太平湖自杀的共有几十个人。

排除了白先生之后，我们再来比较郝先生和朱先生的说法。郝先生描述捞尸的情形说：“太平湖有个小桥，我们划过桥到了太平湖西边，桥头那边，水离岸比较近。我们把他放在地上。他怀里还抱着一摞纸，有这么厚吧，很不整齐，就像咱们的报纸折起来这么大，捆着，是宣纸。根据情况判断，他投水时间不长，顶多一个多小时。纸外面全湿了，里面没湿透多少张。我印象中老舍当时穿的是一个浅色的大褂。过去文人穿的那种到脚面的大襟。穿的是中式圆口布鞋。身上没伤，脸上也没伤，头上也没伤，衣服整齐。这些对判断是自杀还是他杀特别重要。我认为是自杀。我看了看是手稿，大概是《骆驼祥子》或者是《茶馆》的手稿。写着老舍的名字。全都是墨笔写的。”那么，他认为他捞起来的死者就是老舍，当时并无人证，只是根据“手稿上写着老舍的名字”来“判断”的，这一点就值得怀疑。老舍是名人，大家都知道他的名著有《骆驼祥子》和《茶馆》，但他不必一定要抱着“名著的手稿”来投湖，临死也要“制造”出一个“戏剧场面”来惊世骇俗，自杀者是没有这个心情的。郝先生会不会把小说中自杀的场景移植到老舍身上来？这一点对不对，姑且不论。

而朱先生则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就开始上街了，扫‘四旧’。那地方死的人是城里边的人多，城外的少。都是自杀的，最多的一天我跟湖里捞上来十好几个。”“当时我和葛林骑着自行车，几分钟就到了太平湖。”而郝希如根本就没去！“当时捞上来之后，有个演毛主席的特型演员，姓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反正老见面。他在马路西边原来老的电影学院，这地方归我管。所以一些老师、演员当时我都认识。这个特型演员，那天到太平湖玩去了。我们一进太平湖东门，他就匆匆走过来说，这死的人是老舍。”他还说：“我记得当时在河边只有散落的一些稿纸。字不多，是毛笔字，就是一般的纸。印象当中写的好像是香山红叶之类的内容。”朱先生的记忆应该还是比较平实、比较准确的，因为有个民警同事葛林和演毛主席的特型演员可以寻访、佐证，另外他所见的散落的稿纸上写着“香山红叶”之类的内容，也较合情理，不像瞎编的、“硬贴上去”的情节。

最为矛盾的是，郝先生说 he 捞起来的人是浮在水面上的，但“死面冲下”，但他又说，“根据情况判断，他投水时间不长，顶多一个多小时，”怀里抱的手稿，是捆着的，是宣纸，“纸外面全湿了，里面没湿透多少张。”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郝先生也可能从太平湖中捞过死人，但他决不常捞，绝对缺乏常识。投湖自杀的人是不可能“一个多小时”内就浮出水面的，而宣纸的浸润吸水力很强，哪怕“一个多小时”浸在水里，墨笔写的“字迹”也会浸得一塌糊涂，里面的纸也决不会“没湿透多少张”！郝先生估计是看过派出所关于老舍投湖自杀的简略记录，或者听人摆谈过一些现场场景，但他显然没有在场，他把别人的记忆搅浑在一起了，或者把自己臆想的一些成分加了进去。傍名人事件是这一类混淆记忆中较为普遍的特征，我们在口述史采访中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和体会。更重要的是，当朱先生正式出面来更正“老舍之死”的真实场景后，郝先生就“选择了沉默”，再也没有出面来“争抢”这个“唯一的捞尸者”了。可见，郝先生也应该被排除掉，而最后发言的朱先生才是老舍之死“第一新闻现场”的“捞尸者”，他最有捞尸的经历和经验，他最多的一天曾经“跟湖里捞上来十好几个”，这的确不是一般人的经历。（以上材料均引自陈焱、杨东晓等《口述史的困境：1966如何打捞出来三个老舍》，原载《新世纪周刊》）

由此看来，细节的力量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帮助我们“还原”历史，而口述史方法的运用，恰恰在细节的展示上，给出了这种不同寻常的力量。“老舍之死”不应该成为口述史难题，口述史的工作方法，并不能如此轻易地就被否定掉。

2010年11月15日

原载四川省社科院当代史研究所《当代史资料》2011年第1期。

## 【风云人物】

### 姚登山与周恩来

司马清扬

1965年9月印尼发生政变，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合作绑架了包括陆军司令在内的6名高级将领，并殴打和杀害。而此事是因为印尼军方反对苏加诺重用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引起。此举引起军方的强烈反弹，雅加达军区司令苏哈托率兵推翻了苏加诺的统治。因为印尼共产党是受中共扶持的，导致了印尼大规模排华浪潮，并波及中国驻印尼使馆。鉴于印尼“革命人民”有可能开展武装斗争的形势，周恩来特意把赴印尼途中的政务参赞召回，改派游击队长出身的具有军事经验的姚登山去任临时代办。（刘一斌《印尼“九三零事件”发生后》，《世界知识》2006年第1期）

印尼对中国大使馆采取断水断粮等措施，并且派人冲击。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驻印尼大使便应召回国，留下姚登山负责临时工作。姚登山率领使馆工作人员不辱使命，斗争坚决，其本人也因此被称为红色外交家。

1967年4月30日，被印度尼西亚驱逐的中国临时代办姚登山回国。周恩来提出要亲自到机场迎接。（刘一斌《刘振华在外交部的岁月》，《湘潮》2010年第11期）姚登山既让造反派有了一个可以取代陈毅的人选，也被周恩来看成是万

一陈毅被打倒后的“备用胎”。一旦陈毅真的倒台，姚可以成为周恩来在外交部的代理人。

姚登山一回国，就受到周恩来的垂青。在周恩来的运作下，姚登山于“五一”之夜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且拍了一张姚站在中间，左挽江青，右挽毛泽东的合影。如此殊荣，在中共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

此后，周恩来两次提出让姚登山参加抓外交部党委的工作，参加“三结合”的临时业务领导小组。但是姚登山以工作不熟悉为由，没有参加。特别是第二次是发生在火烧英国代办处当天深夜。周恩来说：对领导干部不能一律靠边站。……要搞一个“三结合”的临时业务领导小组，姚登山参加，你们报一个方案。（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179页。所谓姚登山夺陈毅的权纯属子虚乌有。马继森认为，姚非常迷信毛和尊重周。周先让其参加部党委会议，后要他进三结合的临时业务领导小组，他都没去。但是官修史书却说他夺权当了“代理外交部长”，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184页）

姚登山在外交部积极执行周恩来交代的任务，他奉周恩来之命，从5月起到8月，到北京大专院校做外事报告，以图影响红卫兵学生正确对待外事工作，并且参加外交部的文革运动，被得到周恩来支持的外交部造反联络站核心组聘为顾问。

姚登山更在8月26日保护陈毅时立下汗马功劳。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团要劫持参加批陈会议的陈毅，而周恩来又因事未到。在场的姚登山先是把陈毅藏起来，接着又利用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指示把冲击会场的人劝出去。姚登山又及时向周恩来报告发生的一切。周恩来指示姚登山把陈毅安全送回中南海。为了安全起见，姚登山特意把陈毅的车子换掉，由外交部派车，路上还绕道行驶，直把陈毅安全送回。但是此事后来被渲染成周恩来一人的功劳。（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第181-182页）相反，许多问题与姚登山明明无关，却非得把责任推到姚登山头上。幸运的是，这些事情已经被有识之士所纠正。（冉隆勃、马继森《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内幕》，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1-111页）

让姚登山后来倒霉的有两件事情。

一个是姚登山与外交部造反联络站核心组成员一道参加听取王力的“八七讲话”。中间，姚登山问王力，“不是总理不同意‘打倒陈毅’的口号吗？”王力回答说：“总理身份不同嘛。”事后，王力特意修书一封致姚登山，说要陈毅到群众中检查的问题上，周恩来同文革小组是一致的，企图从中找什么裂痕是徒劳的。（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第171-172页）

另一件事是大约在8月5日左右，姚登山在外交部传达关锋、戚本禹的讲话。关锋说，外交部十多年来受到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的流毒是很深的，外交部领导思想上不是毛主席的针锋相对，敢于斗争的指导思想，而是怕，怕什么呢？就是怕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卜伟华《关于文革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卜伟华在

三味书屋的讲演，2009年8月1日。马继森认为王力的8月7日讲话系由姚登山传达关锋、戚本禹的讲话引起，见冉隆勃、马继森《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内幕》第113页）此事被认为同火烧英国代办处有联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除此之外，姚登山倒霉，马继森女士认为“原来姚登山只听命于周恩来，而这之后（指姚登山同关锋、戚本禹、王力谈话——笔者注），他既听周恩来的，也听中央文革的。”，即姚登山脚踩两条船。（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第257页）

曾任外交部造反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的杨荣甲在回忆录中说，姚登山所犯的错误主要就是一件，那就是在王力讲话之后，姚登山也到外贸部发表了一番讲话，煽动那里也夺了政治部的权，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杨荣甲《共和国外交部秘辛：一个外交官在文革的亲身经历》，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王力被抓，形势逆转，姚登山被周恩来一脚踢开，理由是姚登山夺了权：大权旁落了四天。（当时风传姚登山当了四天外交部长，阳木《“文革”闯将封神榜》，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页）1967年8月31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时针对外交部的形势发表谈话，在谈话中，周恩来指责了姚登山，批评了陈家康。（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的讲话，1967.08.31，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周恩来说：从姚登山的表现看，他还不够成熟，他提出一些说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如提“刘、邓、陈一小撮”就是很错误的，这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周恩来对姚登山讲：你回国不久，还不熟悉，我们还要看你，人家要求你当外交部长，连天安门上都有。你作为一个司长，对出现这样的大标语从来也不在我们面前吭一声。……陈家康像一个小丑一样，跳出来反对陈毅，实际上反对我。周恩来又问姚登山在外贸部的讲话，姚说：我对王力讲话理解错误了。周恩来说：总之，你不要推给别人，你自己检查自己。周恩来对姚登山要检查自己强调了好几次。（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

9月份，周恩来当着姚登山的面说：姚登山你在这里，我要再讲一遍：你在对外斗争时是英勇的，我对你的估价是足够的了，是我把你派出国的，你回来我去接你了，我又推荐给毛主席接见了，报上还登了照片。不料你却昏昏然了。（周恩来外事口领导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1967.09.18，《周恩来文革讲话集（1966-1976）》，笔者收藏）

10月份周恩来会见外宾，谈及姚登山时说对姚还是要一批二保。（周恩来接见毛里塔尼亚外宾后和一位翻译的谈话，1967年10月17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但是周恩来对姚登山极为不满了。会见外宾的第二天，周恩来说姚登山狂妄到了极点。（1967年10月28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27期）

于是，当外交部开始清查“五一六”时，周恩来把姚登山和“五一六”联系

起来了。周恩来说：王力在八月七日要夺外交部大权，八月七日的讲话人们取名叫“王八七讲话”，于是“五一六”就贴出天安门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表外交部长。”（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1970.01.24，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版）

后来周恩来更是直接把姚登山定为“五一六”分子。周恩来在当年11月份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谈到清查“五一六”时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在一个光明正大的运动中专门搞阴谋活动的。……姚登山没有填表，他说没有必要参加。他就是“五一六”。（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版）最终，在外交部被定案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20人中，头一个就是姚登山。

最后姚登山以反周，要夺陈毅的权（实则均为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罪名被列为“五一六”头号分子，被关进了秦城监狱，长达9年多。（陈益南《读〈外交部文革纪实〉》，《华夏文摘》增刊，第490期，2006年3月22日出版）

何方先生对姚登山有段精彩的评论：

“公开宣称造反派夺取外交部大权，时间还有几种不同说法：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实际上半天都没有。周恩来批评的也只是越权以业务监督小组名义向有关使馆发电报。传得最厉害的是被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一时捧上天的驻印尼使馆代办姚登山，后来说他夺权当了‘代理外交部长’还上了像《周恩来年谱》这样的正式党史书（只是用了个‘革命领导干部’的讽刺称呼）。实际情况是，姚登山一直迷信毛泽东和尊重周恩来，当造反派的头头时也还是听周恩来的话。不过他坚持只参加运动决不染指行政，因此周恩来先让他参加党委会议，后要他进三结合的临时业务领导小组，他都没有去。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周恩来把他捧上了天（安门），又打翻在地，说他夺了外交大权，是‘五·一六’分子。所以造反派垮台后，外交部召开万人批斗大会，批的头号‘五·一六’分子就是姚登山，罪名是反对周总理、要夺陈毅部长的权。批斗后既未判刑，也无结论，就被送到秦城关押了九年。从批斗到关押，周恩来都没过问。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时，姚登山被放了出来，继续当党员（从未开除过），还恢复行政级别（11级）。现在看来，这位老八路也是一件冤案，但是许多书上至今还在流传着被编造出来的‘造反派外交部长’呢！”（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下，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468页）

---

## 【蓦然回首】

### 我的一段极左经历

李正权

我是1971年10月被招工离开农村的。离开生产队的头天晚上，几个同学来

给我送行。我把最后那点红苕和那点米煮了一锅，好歹让大家吃了一顿饱饭。大家边吃边教训我，并为我“约法三章”：一、所有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东西全部付之一炬，不得带回厂里去；二、到厂里后少交往些；三、做个好工人，少去抛头露面。

那是山乡漆黑的夜，煤油灯一闪一闪，映在一张张黑黑的面孔上，叫人终生难忘。

我与初一的一个女生本来有些姻缘，虽隔着一沟一山，却能感觉到相互的白日心跳、夜来梦境。那年春节，她回城一趟，梳起两个“扫把疙瘩”，从此我就不再理她——只因那些年头梳“扫把疙瘩”就被认为是“操”（川语，讲究打扮之意），这使我不能容忍。招工单位通知我们在区上集中，那天正赶场，她也来了。好几次撞上，她都欲言又止。终于我们在一条小巷里单独相遇。她说：“当了工人，别把我们忘了哟！”那含情脉脉的样儿使我的心一震。但我看见她头上那像七品芝麻官乌纱帽一样晃动着“扫把疙瘩”，心又硬了起来，竟不答理，转身走开。极左思潮在我思想中根深蒂固，使我又一次失去自救的机会。

是的，如果我那时就坠入情网，我会上演后来的人生悲剧吗？

望江机器厂是重庆一家上万人的军工企业，文化大革命中是“重灾区”，武斗之烈全国出名，该厂“反到底”派检查过往船只的武斗哨卡，曾打沉军分区的交通艇，从厂里开出的“舰队”曾溯长江而上，打了一场全国有名的“八八海战”。我当年也作为“反到底”派的中学生红卫兵参加过武斗，与望江厂的几个头头认识。我进厂时，厂里还在进行“批清”（四川搞的一场名为“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的运动，实际上是整四川的“八二六”、“反到底”这一派），同学们为我“约法三章”，是为我好。但是，我并没有认真清理头脑中的极左思潮，也没有丢弃我的书生意气（或所谓的诗人气质）和对社会的迂阔见解，还继续那赤红色的革命梦幻。这就不能不使我再入歧途……

我们是在左倾思潮极度泛滥的年代长大的。我们曾那样羡慕革命战争年代，那样幻想成为英雄，从思维到服饰，从语言到行为，无不打上左的印记。正因为这样，我是那样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成为“钢杆”，在武斗的枪林弹雨中是那样亡命，好几次都差点饮弹成鬼。也是因为这样，一喊下乡，我又毫不犹豫地报名，走了第一批，在农村不到三年，从劳动到外表，我几乎都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在生产队，每年年终结算，我做的工分都是最高的。对我们这一代来说，谁先跨过左的鸿沟，谁就先获得解放。而我是在比别人多吃了更多的亏，栽了更多的跟头之后才觉悟的。

我带着惶恐和希望走进了望江厂。集中学习时，“批清”运动还在掀新的高潮。我们每人都必须写一篇文化大革命中所作所为的材料。别人都写自己是逍遥派，什么也没干。我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如实写了。我觉得我不能对党说谎话。材料交上去了，我更加惶惶不安。谁知分配工作时，竟然没有受到影响（那些材料其实没有任何人认真看过）。我被分配到一个好车间，干装配工。那时，林彪虽然死了，战备依然紧张，生产任务很忙。我没用多久便独立操作，甚至比一些



老师傅还干得快干得多，很快就在车间冒了尖。

那时我在车间混得不错。技术考试从来都是前一二名，“垒砣砣”（干活出成品）也行。别人一天做两三件，我可以做四五件。由于有点文字功夫，多少又读了几本马列，写批判稿广播稿什么的也顺畅。有一次，车间指导员还把我叫到他家里去，请我吃饭，半明半暗地用入党、提干、介绍女朋友之类的许诺拉拢我，要我为他效力。如果我不把学生的那一套迂阔带到工厂里，如果我不把这些一概视为钻营碌位、当官上爬的罪恶，我只要默许，我现在至少也是“县团级”了，而且也不会有以后的遭遇。由于我没有答应，指导员心中从此对我便有了一个斗碗大的疙瘩。

由于是“重灾区”，望江厂两派之间的争斗很厉害，而我恰恰是厂里占多数却又掌不了权的“反到底”派。厂里的“批清”运动还没有结束，中央又叫纠正“批清”的错误，被“批”被“清”者要求整人者平反落实政策，工厂被闹得一塌糊涂，中央又把两派头头叫到北京开“团结联合”的会。后来又是批林反右、批儒评法，接着又是整顿，再后来又是批邓反右，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旗帜不同，口号不同，两派的命运也就不同。今日你得势，明天我占上风，“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由于我思想中的极左思潮没有清理，我身上的派性也就难以消除。开始，我还记着同学们为我订的“约法三章”，尽量小心，上班就上班，下班就看书，周末就回城里的家，不去踩浑水。但是，“约法三章”仅仅是权宜之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一步步介入到两派的争斗中去了。

纠正“批清”错误的时候，车间开大会，指定我发言。我的稿子当然不可能符合指导员那“空对空”的要求。审稿时，他把我联系工厂和车间实际的大段话全部砍掉，把工厂当权者定的“我厂‘批清’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基调加了上去。我不答应，他就不让我发言。我就把情况捅给车间几个被“批清”过的人。他们跑到办公室连吵带闹，指导员只好让我原稿发言。这就使我跨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车间有一个比我进厂早几天的学工，是团支部书记。由于我的派性观点逐渐鲜明，其他方面也还可以，被“批清”的人便拿我当炮弹，去轰打那团支部书记。那团支部书记的派性观点比我还鲜明——只是他是另一派的。他学工转正时，有人借口他的一点小毛病，硬要让他延期转正。在指导员的保护下，他虽然没有被延期，却在车间“脏了班子”（川语：丢了面子），于是就记恨于我，好像是我要出他的洋相。他不像我这样迂阔，不久就到厂团委当干事去了，后来又当了官。

那一年，我正好恋爱失败。其实，那一次恋爱只是我的单相思，女方可能根本就没有那样的意思。如果我正确总结一下经验教训，认真解剖一下自己，就会发现我思想中和我性格中那引我栽跟头的错误和弱点，那么我也可能避免滑入泥坑。可是，我只把女方那高大英俊的男友和自己的外貌作了一个对比，把失败归结为自己的形象寒酸。

厂里有个“反到底”的头头叫张亮，他在南岸区革委当副主任。搞武斗的时候，他是黄山“红二连”的指导员，我是他手下，我们私人关系不错。才进厂的

时候我还遵守“约法三章”，还有意避开他。后来，我就经常到他家去了。那时我住在偏僻的单工宿舍，车间几乎处在停产状态中，过得很闷，又没个走处，到他家吹吹龙门阵，有时也交换一下读马列的心得，竟是一件乐事。那几年，我读了好几本马列。现在想来，诸如《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之类的书，我或者从来没有读懂过，或者就是这些书本来就有问题，加重了我的偏见。当一个人抱着某种偏见时，不管他读什么书，都可能为他的偏见增加论据，所以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前后，工厂经常停电，车间几乎完全停产，我到张亮家去得更勤了。有时，他家还来得有其他人，经他介绍也就认识了。我们谈形势，说看法，观点相同话投机。当然也有争论的时候，越争论越有味，去得也就更加频繁。随着形势的发展，厂里的派头头也常到张亮家里来，我也与他们认识了。记得那是1976年1月底的一天，他们在张亮家聚会，我去串门正好碰上。他们决定在工厂“点火”，拟好了大字报的底稿。张亮要我看看，我觉得那文字的确有些问题，就忍不住作了一些修改。这张大字报以“从众”（他们5人，不包括我）为名贴了出去，在工厂掀起了轩然大波。关于这张大字报，我后来就一直没有能够“说清楚”。

由于有了直接接触，我对这些当头头的人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反感。或者这也是我迂阔吧？我始终反感钻营碌位的人，似乎现在都还有一点这样的反感。其实，官总是要有人当的，你不当，想洁身自好，总不能反对别人也当啊！你想当文学家，总不能反对别人想当政治家、企业家啊！地位、追求不同，考虑的也就有所不同。只要不损伤大多数人的利益，也是无所谓的。当年我就缺乏这样的宽容精神，认为他们是“宋江”（投降派）。有一次，我还和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吵起来。他说我是左左派，是举起一只手打倒走资派，举起另一只手打倒造反派，是唯我独革。我血气方刚，也把他批驳了一通。正因为有这样的反感，我才没有跟着他们跑，在泥坑中继续陷下去。

后来我又做了几件错事，例如在厂团委召开的纪念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十周年大会上，我发言把厂党委书记批了一通。但是，我没有参加过造反派组织的其他活动。在工厂完全停产的那一天，车间都没有人了，我还在干活，把“砣砣”“垒”完了才离开。

严重的是“四人帮”垮台后，我的思想转不过弯来。同病相怜吧，我又常到张亮家去。我和他，还有他的一个“学工”（大学生），“英雄”所见略同，一起发泄不满，一起发泄对“四人帮”的怀念。“讲清楚”运动的时候，那些发泄便被人翻出来，成了我最大的罪过。

“四人帮”垮台，宣告极左路线破灭，但并不等于受极左思潮影响和毒害的人一下子就转过弯来。从震惊到迷茫，从痛苦到反思，从解脱到反戈一击，我经历整整三年的时间！这三年是我人生路上最痛苦也最危险的时期。我终于闯过来了，没有去跳长江（自杀），也没有成为左倾路线的殉葬品，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多年前，有人给我看手相，说我30岁前有一场大灾大难，不死也要脱一层皮。

真的算得很准啊，我真的脱了一层皮。岂止是脱一层皮，是思想观念的大转变！现在想来，心尖尖也禁不住一阵阵颤栗呢。

“说清楚”运动中，我在班组和车间的大会上不知作过多少次交代和检查，不知认了多少回罪。我写的交代材料，至少也有几十万字。但是，还是“说不清楚”。好我在车间人缘还算不错，几个当车间主任的都认为我工作不错，还需要我“垒砣砣”，需要我为车间完成生产任务，所以我还没有挨过打（批斗时按脑壳之类是必不可少的，不算挨打）。有一段时间，我不能离开工厂，不能进城回家，我的信件被指导员私自拆开，我除了写材料和“垒砣砣”外，什么也不能做。连厂里一些派头头都过了关，我还要“翻烧饼”。十一届三中全会就要召开了，厂团委还是决定给我“撤销团内职务（我是团支部组织委员），劝其退团”的处分。据一个知情人说，厂团委在研究的时候，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某书记说：“就凭他这个名字，就晓得他有野心，想夺取政权，所以必须给他处分！”

“说不清楚”使我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1977年和1978年两年高考，车间都不许我参加，后来我就超龄了。

自己挨整，亲身体验，我才真正认识到“斗争哲学”的残酷和荒谬。从内心来说，我并不反党，更不反社会主义。相反，对党和社会主义我还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因为我父母解放前受苦受难，他们的教育对我影响很深。而且，我毕竟读过几本马列，毕竟信仰马列。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在厂团委对我所作的“处理决定”上，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使我不能不对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开始，我感到自己是上当受骗。这使我想起李白，怀着“为君谈笑静胡沙”的壮志，参加永王李璘的军队，结果却因为李璘与李亨争夺皇位而获罪流放。何其冤也！

我责怪自己太“浪漫主义”。我从小爱好文学，进厂后写了不少诸如“我是车刀，我是车刀”之类的诗，还在《重庆日报》上发表过散文和散文诗。我下决心告别“诗歌姑娘”，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除写交代材料外，一个字也不写。作为单身工人，我不打牌不下棋，又无心思看书。下了班，宿舍里呆不下去，便一个人在空荡荡的马路上踟蹰，脑海里一会儿乱哄哄的，一会儿又空寂得像黑洞。那时，我才理解了李白那“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的苦闷。

人只有在地狱里熬过，才能真正理解人生，才能珍惜每一个平平凡凡的白天和黑夜。在最难捱的日子里，我体会到绝大多数人的善良，我不会忘记那些曾向我投来一颦一笑的人们，不会忘记那些哪怕只说过一句公道话的人们。当然，我也尝够了某些人的势利，遭遇了某些人的落井下石。一个与我几乎快要同居的女子，听说我是“说不清楚”的人后，立即和我“拜拜”。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姑娘走进了我的生活，支撑了我的精神，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我摆脱了左的泥沼，使我逐渐抛弃了虚幻的理想和迂阔之见来面对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胡耀邦挽救了我，是邓小平挽救了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挽救了我。当我面对现实，我才真正感到解脱，浑身都有了轻

松的感觉。当然，不是说外界的压力已经完全消除，在车间我还继续列在另册里，还只能夹着尾巴。我说的是思想上的解脱。我从极左思潮中，从左倾路线的那一套中解脱出来，似乎走进了一个新的天地，于是就有了重新做人的舒畅。

我重新拿起了笔。我开始写小说。我写了一个年轻工人，写他是怎样红起来的，又是怎样死的，死后又是怎样成为英雄的。1980年元旦，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伏在床边，一口气便写了15000多字。这篇题为《愿他在地下安息》的小说，刊载在《红岩》杂志1980年第一期上。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翻过了一个山坳。那是一段多么崎岖、多么危险、多么艰难的路程啊！

（作者附记：本文写于1993年，当时的思想认识就是这个样子，文中诸如“极左思潮”之类是当时流行的术语，为保持原样，只好不改了。）

---

## 【蓦然回首】

### 一个短笛手的命运

王 锐

1962年秋，我高中毕业，“因故”高考落榜，到1965年5月正式就业，有近3年属于“闯荡社会”。偶尔去乡村小学代课，或是在街道“普工队”打零工，多数时间在家闲过。尤其1964年之前，不到20岁的年龄，脑子里充满幻想，除喜欢文学读小说诗词外，还深爱音乐、绘画，且乐于实践。自己练过素描，画过水彩、油画。临摹名画，也出门写生。音乐方面，学拉二胡，崇拜刘天华、“瞎子阿炳”，甚至浪漫幻想像阿炳一样，持一把二胡“行走天下”。可惜这些都是无师无门，个人关起门瞎摸索，难有什么大的长进。

也由此，对地方上同龄或是年长的音乐、绘画人士，尤其是道中“高手”，就多有接近追随，及至心内敬慕崇拜不止。记得是1962年下半年至1965年间，家乡城市活跃着一批民间音乐人才。开始是松散的“沙龙性质”活动，到后来正式组成一个民间乐团。外人呼之为“洒淇玛乐团”。为何如此冠名？我私下多作打探，有人回应称：“洒淇玛可口好吃。”“洒淇玛”在眼下已是很普通的糕点。而当时，却是极稀奇的高级食品，一般人望而不得，只能心向往之。可见这个民间乐团在年轻人中的地位。其正式成员都是坊间乐器高手。

大概是1963年一个温暖的春夜。在自贡一中一间灯光明亮的大教室里，这个“洒淇玛”乐团的主要成员，有一次活动。那天真是热闹非凡，场面、过程，以至一些细节，几十年了，我仍然印象深刻。平时这种活动，多在室外，如滨江路河沿，或公园长廊，以及某空旷地等。这天，不知是谁的关系，竟打开了一中的一间大教室，两只40瓦的大日光灯将教室照得如同白昼。那个年代，大日光吊灯简直就是奢侈品，只有一些机关厂矿的大会议室，或是市内为数不多的重点中学的教室才配备。

那似乎是间音乐教室，因为室内有一台很漂亮的脚踏风琴。正在弹风琴的是一个年近 30 的男子，长脸，平头，姓刘，听人称他“刘木匠”。其职业也真是个木匠，而且是游乡走村那种，俗称“游方木匠”。他那一手风琴弹得真是好，左右手都能奏出“五度和弦”。也极投入，旁若无人。弹得兴起，还会随曲调引吭高歌（据说“刘木匠”游走乡村时兴致来了，也不时亮开嗓子唱歌，唱的都是中外名曲）。

“刘木匠”嗓音也不错，唱得有激情，动听。那天晚上他亮嗓唱的是《外国民歌 200 首》上面那首经典的叙利亚民歌：“姑娘你好像一朵花，为了你的眼睛到你家。把我引到了井底下，割断了绳索就跑啦……”“刘木匠”唱到这里，脑袋后仰，眼睛微闭，一副很忘情很伤感的样子，两眼不看键盘，10 根手指却能灵巧准确地在琴键上移动翻飞，并不走调按错音，给人印象极为深刻。

那晚上还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就是那位“短笛手”。当晚在现场吹笛献技的笛手，一共 3 人，其中两人我认识，还颇熟。一位是我初中同班同学的堂兄，他是自贡一中 1960 级高中毕业生，早我们两级。此人一直是这个“洒淇玛乐团”的第一短笛手。其家庭成份不好，1964 年底在城市知青下乡中被迫随女友下乡，在靠近云南的珙县安家落户，十余年后才返城。另一人小名叫“祥子”，是我一位堂姐高中闺蜜的弟弟，因堂姐关系，我与他早就相识，并在他家住过。“祥子”后来去了外县一文工团当笛手，正式吃上了“专业饭”，算是从业余爱好者转为编制内专业人士。这在当时那批民间乐手中极少。

第三位就是本文要谈的“短笛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也是几年后在文革中“残酷相逢”之外的唯一相见。我之所以对他印象深刻，在于他作为差不多同龄的年轻人（比我稍小或稍大，至今不详），却有一张略显苍白，沉静忧郁的脸庞，和似乎时刻带着沉思神情的眼睛。模样不算清秀，却让人过目难忘。

那晚上，三位“短笛手”聚在一角落，轮流吹笛演奏，都是自己平时较拿手，发挥出色的曲子，几个人带有互相展示，比试演奏技艺的成份。我等几个外行围着看，不懂笛子演奏，只带点艳羡的表情和心理看热闹。分不清几个人吹笛谁第一谁第二第三。觉得都吹得很好，技法出色，我等只能望洋兴叹。

还有一点印象深刻的是，这位不知名“短笛手”的沉默少语。那晚上整个聚会中，他几乎没有说话，除了自己吹笛，就是看人吹笛，差不多与人没有语言上的交谈。隐约听人说他姓吴，除此一无所知。

其后不久，这个民间的“洒淇玛乐团”被区文化部门“收编”，承认为区文化馆领导的业余乐团。除参加区内各类文艺汇演外，还在文革前“大唱革命歌曲”活动中大显身手，在闹市街头演奏演唱和教唱《人民日报》用整版推荐的几首“革命歌曲”。以后乐团的这些活动，我再也没见过那位脸上总带沉思神色，眼神阴郁忧伤的“短笛手”。想来，他不是乐团成员，那天只是偶然碰巧参加一次吧。

以后，不管我也好，乐团多数成员也好，面临的是就业、婚姻两件“人生大事”，各有所忙。再以后，就是文革，当年乐团可以三五人自由聚散，乃至演奏唱歌的气候再也不复存在。人人提心吊胆过着平常日子。

转眼到了“一打三反”。

记不起到底是1970年的上半年还是下半年。市里有一次规模很大的公判会。我是否在现场参加了那次公判会也无记忆。但却在离大会场（檀木林体育场）不远的灯杆坝街口，碰到了行刑前游街示众的车队。那应该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人生经历之一。

灯杆坝（1950年代后更名为中华路，但市民仍习惯称灯杆坝，至今如此）是一条老街，当年街两边的店家，是带房檐阁楼的旧式瓦房，街道很窄，除了行人，仅能容一部卡车通过，街面却极热闹，商家极多。因这条老街与通体育场的檀木林大街相连，几十年来，不管是重大游行活动还是公判后的游街示众，都必须经灯杆坝。

那天，我正走在这条街上，忽觉街上行人骚动，一抬头，方知“游街车队”已经到来。赶紧退到街边，驻足观望。那时当局处决人的车队，尚无一路鸣着尖利警笛闪着警灯的现代警车。开道的，先是一辆老式军用吉普，顶上一概装有一个硕大高音喇叭，一路缓行，喇叭中反复播放着刚才公判大会现场宣判的实况录音。其后，照例是一辆装载“行刑队”士兵的大卡车。车头架着一挺机枪，一个机枪手立于枪后，作欲射击状，以示警吓。再以后，才是载着各类囚犯的数辆或是十数辆甚至数十辆大卡车。

一般来说，囚犯车辆的顺序，是死囚在前，然后是“死缓”、“无期”及各类有期徒刑。死刑犯享受“优待”，是一车一人。其余是两人、三人乃至多人一车。曾被鲁迅先生痛批过的中国民众多年积淀的“看客”心理，人们最想看的，最乐意看的，自然是待处决的“死囚”。

那天，在街头遭遇游街车队，前导车和士兵车过了，打头的“死刑”车是一或两台。我无论如何没想到的是，第一辆“死刑车”（或是唯一），昂头挺立前方的，正是数年前那个春夜与我有过一面之缘的“短笛手”！

其时，他被五花大绑，背上插着长条形尖角的“死刑标”，左右两边，各有一士兵用手抓住他肩膀。不过，头颈尚可自由活动。我惊讶地发现，他正利用仅有的一点“自由”，微微转头，用眼睛打量街边围观人群。

更令我惊奇的是，不同于平常所见的“死刑犯”，已被即将到来的处决，以及公审公判大会（数万人至10万人）的气势吓得面无人色，双眼紧闭以至瘫倒。他依旧是数年前那个夜晚我第一次见到那副模样，面色十分沉静但苍白阴郁，眼神略带思索和忧伤，却看不到一丝恐惧之色。不挣扎也不畏缩，甚至能相当平静地用他那眼睛来回注视街两边围观市民。真正是一首名诗里的意境，“你在看他当风景，他也在看你当风景。”

由于那条老街非常窄，车队行走十分缓慢，大约就是一个人步行的速度。站在围观人群中的我，和车上囚犯的距离，顶多不过两三尺。所以对他当时神态乃至眼神，看得非常清楚。让我惊骇不已的是，在他用眼睛往街边人等缓缓注视时，有那么一瞬间，突然与我对了一下眼神，真正的“四目相望”（也可能是我一时的心理作用，弄不清楚他是否认出了我）。

我立时大惊，赶忙避开眼光或是干脆低头。事隔多年以后，我痛恨我自己很怯懦，很可笑。可是当时，来自内心本能的恐惧，我真的生怕他认出我，被他用眼神甚至点点头招呼（其时，他口中并未塞什么东西，仍可开口说话）。如此，自己将被视为他的“同案犯”，惹得车上押着他的士兵和公安，跳下车来，抓我上车，或是被周围“阶级斗争观念强觉悟很高”的“革命群众”大喊：“这里还有一个同案犯！”争先恐后过来抓我送上囚车，一并带走……

谢天谢地，“游街车队”终于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

不过，当天及过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处在不安、惊吓、恐惧，还有深深为之惋惜的复杂心绪中。竟然连处决人通常会张贴于大街小巷的“布告”，都不敢去看或是不忍心看（这是多年来我最为后悔的事）。那么年轻的一个生命！那么富有才气富有教养的一个有为青年（那晚上他吹短笛的技艺以及那种沉静优雅的举止，包括忧郁的眼神真是叫我着迷）。在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之后，仅仅几十分钟，就将被“行刑队”士兵的枪弹打爆脑袋，血肉横飞（那年头的处决，一律是近距离枪击后脑，场面十分血腥）。

也谢天谢地，随着毛泽东去世，变幻莫测，令人胆战心惊的文革终于结束了。我自己也是几次有惊无险，什么事也没发生就过来了（毛泽东逝世，我被单位同事举报为“反革命”，有些人联名直接上书公安局，要求逮捕法办。市局也派员调查一阵。好在单位头头及上级机关保卫科长原卫生局同事力保，侥幸逃过一劫）。

再以后，我开始文学写作，1980年代末我离开原单位，不久也离开那个城市，在外边闯荡，直到新世纪初回归故乡。开始致力于一点文革研究之后，那位“短笛手”被处决之谜，自然成了我最想打探了解者之一。可惜事情一直没有头绪。我问过好多人，包括当年那些乐团成员，以及和我们那批“社会青年”年龄相仿，当年又有些交情，对所谓“政治”有点兴致者。仍是一无所获，都说不知道有“吹短笛吹得很好，文革‘一打三反’中被枪毙了”那样一个人。我也不便于到有关部门查证，招惹麻烦。

久寻不得，到后来，连我自己也疑惑起来。毕竟只见过一面，那天在街头刑车上偶然撞见，也不过10来秒最多几十秒功夫，一晃而过。是不是自己看花了眼，认错了人？但疑惑在脑际，始终不散。

直到今年5月，一个很偶然的机遇，才终于解开这个谜。消息证实，那次遭难的，正是这位“短笛手”。

那天下午，一个熟识的年已7旬“老书贩”给我送来一批文革中某农村公社，奉命全面清理审查境内所有地、富、反、坏（缺“右派”）“四类分子”的原始档案材料。很详细齐备，每人一大册，什么材料都有。

我照单全收，两人在住宅楼下一背街小店闲谈一阵，正欲分手，小道上迎面走来一对老年夫妇。男性老者70多岁，体弱多病，步态很差，是位老教师，其实应算近邻，在楼下小区我多次见过，却不知身份姓名，从未打过招呼。不料他与这“老书贩”却是熟人，极熟极友好那种。

“吴××，你这个‘反革命’，还健在呀？”

这是“老书贩”招呼调侃对方的第一句话，然后彼此一阵笑语。可见两人关系熟到开玩笑毫不顾忌的程度。后来方知，两人文革前的1960年代中期均因“反革命罪”坐过十多年牢。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虽“平反”，却未“落实政策”，为谋生而打工相识，彼此同病相邻，成为朋友。

这位吴老师，身上颇有故事。原是重庆15中学物理教师。他之蒙冤入狱，如今看来，简直可称“天方夜谭”。1959年，他响应号召下放在某工地劳动。有一个处得好的朋友。有天，在寝室里，朋友拿出自己的饭票在清理，已临月末，尚余有饭票3斤半。这人很高兴，当众报出数来。旁边有人羡慕说：“你好阔气啊，一个月怎么吃法？还有3斤半！”那人回答说：“你没看见，我这个月四处打游击哇？”“打游击”为当时四川方言俗语，意为去别处“蹭饭”。都是玩笑说谈，几个人笑说一阵也就过去了。没想却因之惹祸。

1962年，毛泽东又大抓“阶级斗争”，各地响应。此事被人无端揭发。又正逢台湾在叫喊“反攻大陆”。这句所有四川人都理解的“打游击”俗语，竟被说成是配合台湾“反攻大陆”，试图拉人“上山打游击”。说这话的那友人就此被捕。可是“打游击”不能只是一个人打。办案人员深挖“同党”，严刑逼供下，那人只好胡编乱咬，这就牵出了已返市内15中任教的吴老师。然后又揭出他曾经议论过赫鲁晓夫之类的其他“反动言行”。

1963年，吴老师以“反革命”罪被判刑8年。有意思的，后来的判决书中却没有了所谓“打游击”的内容，而都是新“揭发”罗列的罪行。那位说“打游击”惹祸的朋友，也判刑8年。

这位吴老师劳改生涯最终长达13年。最初在武隆修水库，数月后移到雅安“苗溪茶场”。这个“苗溪茶场”因关押过胡风夫妇在海内外享有大名，章诒和女士也曾在此服刑。听名字，“苗溪茶场”颇带点田园色彩和诗意，其真正名字，应叫“川西监狱”，是省公安厅直管的四川几个大监狱之一。听吴老师讲，最多时，押有1万多犯人。省会成都也属川西地域，所以胡风夫妇才会送到这里来。

因与胡风、章诒和等同狱多年（吴老师1976年10月才离开劳改场地返家，共服刑13年整），笔者很想打听一点当年情景。也曾多次拜会吴老师，想弄点“口述史料”。可惜的是，当年劳改地，只知胡风在此，却从未有任何谋面机会。胡风夫妇单独关押，与其他人犯隔绝。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一切不知。此外，吴老师年事已高，眼下走路说话都相当吃力，也从未有过将其经历诉诸于文字的想法。交往中，我曾借给他那册梅志所著《我陪胡风坐牢》，让其一阅，试图让他相应回忆起一些往事。然而，他看书认字已十分吃力了，心脏也不好，医嘱忌激动（其夫人电话中告我，那天他初读《我陪胡风坐牢》后，确实十分激动，大概勾起了许多往事记忆）。从老人身体着想，我只好作罢，打消了进一步访谈的念头。

现在回头来说那位“短笛手”，原来是吴老师的堂弟。他那吴家，似乎也是大族，他那一辈叔伯兄弟姐妹十多人。“短笛手”名字叫吴光曦，生前是自贡市



邓关盐厂（文革中改名“跃进盐厂”）职工。确于1970年“一打三反”中因“反革命”罪被处决，其时仅20多岁，尚未成家。遗憾的是，这位吴老师其时正在“劳改”中，一切都是1970年代末“平反”返乡后才听吴家族人所述，详情不知。也谈不出我想深入了解的那些情形。

结合当天“老书贩”所简单谈及的，其罪行主要是“为刘少奇鸣冤叫屈”等等，被捕后不认罪，甚至对审讯人员扬言“要告到海牙国际法庭”等等。因之在“一打三反”中遭极刑。

不相信“伟大、光荣、正确”的执政党主持的中国法律和司法体系是世界上最公正、最完美、最“代表真理”的法律和司法机构，而试图在“国际法庭”中去“讨公道”、“求司法正义”。这种事，在眼下都是很犯忌讳的（甚至可能遭罪），何况当年那等黑暗无比的文革中。“短笛手”吴光曦的悲剧性命运当然是注定了，万难逃过一劫。不过，当年那种舆论一律，且封闭严酷的社会背景下，年仅20多岁的年轻人，竟有这种非同一般的眼界、胆识和勇气，而且敢于将之表达出来，敢于抗争，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真是类似遇罗克一般年轻思想者。

行文最后，笔者不得不更加遗憾地提及，这个敢独立思考，反抗极权，反抗专制的勇者，至今仍背着“反革命处决犯”的罪名，未获任何形式的“平反”。直接原因是，其遇难时未成家，无子女。文革后，其父已亡，其母病弱（据说有精神病）无力申诉，不久亦离世。亲兄妹年龄又小，不明世事。族人中亦无人站出来（可能有顾虑）向当局要求申诉。如此情形下，当局（包括原单位）也就视而不见，不闻不问。直到现在，吴案仍以当初那种罪名罪状，存于共和国司法档案中。为当年的“打击反革命”运动，显示着实绩，增添着成果。

2011年6月15日 —18日自贡危楼书屋

---

【史林一叶】

## 文革中陈战武的忆苦报告

杜钧福

陈战武，一作陈占武，是文革期间北京鼓楼中学军宣队指导员。他有一篇著名的《忆苦报告》，当时到处流传。我们是1969年在天津的小站解放军农场听的录音，至今还有印象。最近我看到一本他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的印刷小册子，是湖北省黄冈印刷厂1970年4月印的，看样子是作为随身携带的阶级斗争教育材料批量印刷的，足见当时的重视程度，也说明这个报告在那几年里流行到全国各地，风靡一时。

在文革这个特殊时期，这一事件是绝无仅有的。要知道，文革是要实现“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无产阶级专政”，对意识形态的实行垄断化模式化的严格控制。毛泽东著作特别是《毛主席语录》，成为唯一的而且是至高无上的经典。这经典是排他的，不容许任意诠释。文革前曾有一些阐述毛泽东著作的辅导性文章，如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解释《矛盾论》、《实践论》的小册子，在文革初期就被批

判为大毒草，作者被迫害致死。大概是 1968 年，我曾在北京大学看到一张大字报，内容为批判该校一个“反动小集团”。该集团罪状有二，一为反对林副主席，这姑且不论；二是研究理论。大字报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把所有理论问题解决了，如果再研究就是反对毛主席了。所以，这里所持的逻辑和中世纪的欧洲对自由思想的禁锢一样，就是说，如果你的理论和圣经一样，有圣经就够了，没必要存在；如果和圣经不同，就是异端，应予取缔。

所以这个意识形态的专政，谈不上无产阶级的，也不是共产党的，也就是毛泽东和他周围那几个人的。在当时还曾有过另一位解放军复员人员的报告，据说是《林海雪原》中解放军小分队成员孙达德的原型。但是他不久就被江青打成“破坏样板戏”的“反革命分子”而被逮捕。今天看来，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说这些，就是想说明陈战武这个报告在当时确实是绝无仅有的文革样板，值得研究。

先说我当时听了这个报后的印象。文革前，我也听过一些忆苦报告。其中有些感觉不坏，例如一战华工白宝纯的报告，虽经当时阶级斗争理论的包装，但内容仍很生动，真实反映了二十世纪前期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特别是北平市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

然而陈战武的报告完全两样。他的报告没有任何具体社会背景，虽有时间却无地点，而反映的社会关系不像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却像奴隶制社会。而具体的描述，即所忆的“苦”，完全是没有人性的地主对他一家人肉体上的折磨和残害，所以听起来根本不像什么阶级教育，倒类似今天的虐待文学之末流。所以当时就感觉不真实，也怀疑一个人能否承受那么多酷刑。当然，这种怀疑当时不敢有一丝流露。

事隔 40 年，今天阅读这个小册子，和原来的感觉相同。

先介绍一些该报告主要内容。故事从 1933 年讲起。作报告的主人公的家里有祖父母、三个伯父和父亲、两个姑姑。因房无一间地无一块而一家住在破庙里。后来日本鬼子抓壮丁，被地主引导抓走大伯二伯。大伯组织共产党员和鬼子斗争，被鬼子用铡刀铡死。二伯给关在屋子里烧死。地主又抢三伯给他家放牛，怕他为穷人报仇，给捆起来淹死。陈的爷爷病死后，地主又用 15 斤高粱将他父亲买去当奴隶，这 15 斤高粱还不能吃。他父亲被捆在大磨上，挨皮鞭，做牛做马。日本强盗为了做实验，又把两个姑姑抓走，在破庙里支起大锅，把两个姑姑肚子割开，挖掉心肝，扔进油锅。此后，破庙里只剩奶奶讨饭度日。“好不容易熬到 1938 年，我母亲到了破庙。”“狗地主”又在陈出生三天后抢走了母亲给他们当奶妈，不用时关进水牢。母亲在地主监狱墙上掏个洞逃回家中又被抓回，遭受酷刑折磨致死。此后主人公跟着奶奶讨饭。奶奶死后，他到了地主家，从“隧道”里钻了进去，看到他的父亲仍旧脖子上挂着铁锁链，拴在那儿推大磨。这种苦日子直到 1948 年解放为止。

这些故事如果是真的，确实够煽情的了，当时也引起不少眼泪。但是经不住简单的推敲和思考。

首先的问题是，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日本鬼子”的故事主要发生在 1933 后几年。倘如此，只有在关外，日本人才在 1937 年以前入侵。那么故事是发生在东北地区了？但是报告又说，日本人扫荡，“凡是共产党员家，凡是穷苦人家，全都把房子烧着了，”又很像老解放区或冀中抗日根据地。而东北地区，李兆麟、赵尚志、赵一曼这些共产党领导都是从关内派去的，领导的部队名义是抗日联军，未必有机会在农村发展党的组织。

疑问二是日本鬼子确实拿人体做过医学实验，如 731 部队，但是从未听说把小女孩放在油锅里炸的实验，而且是当众进行，唯恐罪行不被人看到。这种故事使我们想到义和团时代，当时盛传教堂里的洋人拿中国人的眼睛做照相机。这种谣言还有些联想的根据，因为眼睛确实是个小照相机。比起义和团来，这位报告人的造谣本事差得远了。

疑问三是报告人父亲的经历。这位父亲于 1936 年 18 岁的时候被卖到地主家，拴在大磨上推磨，失去自由。报告人是 1939 年出生的。他在几岁（也许十来岁）的时候到地主家，看到他的父亲仍然脖子上挂着铁链，被迫在推大磨。这里报告没有说明在此前这位一直拴在大磨上的父亲是怎样娶妻生子的。

再者就是人体能否经受如此严酷的刑罚。他的爷爷给地主扛活 32 年。地主看他中不中用了，一脚踢了出去，还用锥子把他爷爷双眼扎瞎了。抢走大伯二伯的时候，“狠心的日本强盗又照我爷爷胸脯上扎了好几刺刀。”“买”他父亲的时候，地主又“照我爷爷头上打了三、四拐棍”。这爷爷过后仍健在。

他的母亲被抓回地主家，关进水牢，还在水里放了辣椒水，“疼得我妈叫天天不应”（那该放多少辣椒水？），折磨够了，又下了毒手：“把我可怜的妈妈吊起来用皮鞭、钢丝鞭打得我妈妈死去活来，头发一撮一撮的被他们拔光了，头上给钉了两根竹签，烧红了铁铲和铁棍烫我妈妈，用烧红的铁棍从我母亲前心穿到后心，又烧了开水灌在壶里，从我母亲头上往下浇。”我当时就是听到这里开始不相信的。

这样的漏洞甚多，难以一一列举。报告人完全是信口编造，而且编造得很拙劣。然而，只有这样的怪胎，才能在文革那种环境下存在，而且广为传播。

当然，这种造假术并非文革中的发明。在文革前夕，从八届十中全会提倡阶级斗争开始，或者更早，从 1957 年反右开始，就有这样的作品问世。例如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如《收租院》和冷月英关于水牢的忆苦报告。但是文革中这种做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才有了陈战武的报告。

但是，我要提到这些“作品”或报告的另一面，真正令人战栗的另一面，就是尽管他所说的纯属编造，一个人也不能承受那样多的酷刑，但是此君一语成谶，就在他作报告的同时，酷刑和屠杀遍布全国各地，而且惨烈程度远超过他的想象。

我有一位朋友 H 君，文革时分配到内蒙地方上工作，适逢深挖“内人党”，耳闻目睹了许多普通人难以想象的黑暗内幕。当时对审查对象所施行的酷刑之恶毒、残酷、非人性，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听说过的纳粹集中营和

所谓中美合作所。这些酷刑我难于在此描述，否则也变成了虐待文学。

在陈战武报告讲述之前，在北京的“红八月”里，也发生了类似的情景。像上述报告里所说的拿开水往人头上浇，不就是当时许多红卫兵所为吗？作家陈行之曾亲眼见这样的兽行（见《权力状态下的道德畸变》，陈行之博客）。

我的一位亲戚当时住朝内大街。前几天我听她说，当时街道上有位妇女被关了起来，口渴要水喝，人们只给她喝煤油。

还有著名的“大右派”章乃器，他在“红八月”里遭受红卫兵冲击后不久写成的《七十自述》中记叙，这是他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从8月24日到31日，整整八个昼夜，他在绝食中受到百般拷打，折磨他的方法有：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划了火柴烧手，用汽枪射击头面，用水壶灌鼻孔，强迫吃肮脏的食物，用油彩涂脸，用氨水灌鼻孔……（载《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

在1967年的湘南大屠杀中，在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中，血腥残暴的程度令人毛骨悚然。在广西不止一地发生剖活人肝而食的事件，更是惊心动魄、旷古未闻的惨剧。

这正是极端的阶级斗争教育的结果。不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从资产阶级专政学来的吗？这一系列民族惨剧将陈战武报告及类似的宣传品所发展到极致的愚昧、野蛮的意识形态充分体现出来。

陈战武本人或许只是造假，并未作恶。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如此。1974年我在大连听说当地有一位著名的俱乐部主任支左，据说也是苦大仇深的，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拷问被审查人员时发明了一种“鼻钩”，即拿铁钩将被拷问人员的鼻子钩起来，并承担全身重量，使其痛苦不堪，感到生不如死。

周扒皮半夜鸡叫（我们姑且假设有此事），目的是督促长工早起，给他干活，是一种功利行为。而“鼻钩”则完全是拿别人的痛苦引以为乐。

鲁迅先生说得好：奴隶当了奴隶主以后，会比奴隶主更凶残！

最近看《舒芜口述自传》，谈到解放初期张云逸在广西主政，说起地主父母问题。他说父母还是父母嘛，不是人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当然后来张云逸这样的“老右”很快被陶铸取代了。张云逸的说法，既坚持了阶级论，又是人性论。但十几年的光景，意识形态越来越极端化，终于在文革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荒谬程度，酿成旷古未闻的惨剧。

---

【史林一叶】

## 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

（未删节版）

孙言诚

按：本文原发表于《炎黄春秋》今年第二期，发表时有删节。因被删节的一些内容比较重要，本刊征得作者同意，将未删节版完整发表，供有兴趣者参阅。

2009年11月23日，北京市大兴区发生一起灭门案，凶手李磊捅死一家六口，包括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五天之后，李磊被缉拿归案。一段时间，网络、媒体沸沸扬扬，中央电视台做了两期节目，展现了案件的经过和审判的全程，充分显示我们全社会对生命的关爱和对暴徒的憎恶。

此事让我想起了1966年发生在同一地区的大兴“八三一”事件。那次事件灭门22家，杀害三百余口，手段之残忍远非李磊可及。然而，四十五年过去了，事件至今鲜为人知。为使此类事件不再发生，我们有必要像对李磊案一样，理清事件的原委，分析产生的根源。

### 阶级路线推向极端

建国后，我国各级学校一直在贯彻执行一条阶级路线，即“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思想表现。”这条路线掌控着全国青少年的人生：升学、就业、入党（团）、提干、参军，甚至婚姻，无不受其影响、由其决定。从字面上看，路线是“重在表现”，实际上真正重视的是“成份”。因为表现是虚的，成份却明明白白地记在档案中，极易掌握。

1963年之后，阶级斗争不断升温，阶级路线遂演变成赤裸裸的“唯成份论”。“黑五类”子女，大学基本不收，重点高中也开始拒收。有的农村甚至连小学升初中也规定：“出身占60分，表现占20分，学习成绩占5分，其它占15分。”1964年的高考，“黑五类”子女全军覆没。在高干子弟纷纷留苏、留欧和进入哈军工、清华等重点大学时，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却踏上了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据《无声的群落》一书记载，64年奔赴大巴山垦荒的两万初、高中毕业生，绝大多数出身不好，其中不乏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却被挡在了大学甚至高中的门外。

那个年代，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子女是“无声”的，而占尽先机的干部子女却起来“鸣不平”了。1965年初，北京市发生了四·六·八学潮，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学生，以干部子弟为主，进行串联，组织罢课。他们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尖锐地批评学校领导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产阶级子女受老师赏识，而干部子女却受压迫。北京市委被迫派出工作组，到这些学校去搞四清运动。虽然被他们批评的校领导遭到清算和撤换，但工作组并不认可学潮。彭真在对65届大学毕业生的讲话中说：“对家庭出身不好的还是重在表现。”“过去中共中央文件里面，毛主席的文章里面，都讲团结90%以上，但第一个十条里面就讲团结95%以上。为什么讲团结95%以上？就是把地主、富农家庭的子女放在这个95%以内。”

在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之时，彭真这番话显然不合时宜。文革中的红卫兵讥笑他是“重在表面”。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

阶级斗争的对象已经由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出身于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把这些人定性为“国民党”。

四、六、八中的高干子弟，其实早就从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中，理解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们为了当好“革命接班人”，勇敢地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坚决主张用“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取代文化课的学习。宫小吉《换取五分的秘密》发其端，文革中废除高考的倡议终其成，四中的学生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钦定的“国民党”。用刘辉宣（礼平）的话说，它们是冲着国旗上的两颗星（指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因当年对国旗上五颗星的解释是：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去的。

毛泽东支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可以说是四·六·八学潮的翻版。他们批判地主出身的校长万邦儒，批判重点依然是贯彻阶级路线。他们宣称万邦儒重用资产阶级的子女，压制干部子弟。一位红卫兵的家长如此分析：“这就是对我们的专政。他们早把我们恨之入骨，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没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早把你们杀光了。这里面有阶级仇恨啊！”（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76页）这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真是透彻至极。

毛泽东关心的是教育界的领导权，红卫兵关心的却是“接班人”的争夺。在“黑五类”子女淘汰出局的形势下，能与干部子弟一争的，只有两颗星（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的子女，而击败这些子女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阶级路线。还是那位家长，一语破的：“在你们这样的学校里，团结95%可能不太适当吧……对右派学生，你们心里都有底，一个成份，一个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就足以卡住他们，不让它们升学，让他们好好改造。”“在学校里，这些人是改造不了的。”（引自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87页）

阶级斗争不仅要年年讲，而且要代代传。于是，一副血统论对联应运而生：

老子英雄（后改为“革命”）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 血统论笼罩京城

对联一经产生迅速风靡京城，传向全国。以革干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狂呼着对联，冲进北大、清华、人大游行示威。北京的大、中、小学校园里，到处贴满对联。激动、亢奋、狂热的对联拥护者，不允许任何人持有异议，在高校和中学，关于对联的辩论常常是通宵达旦。辩论会其实就是对出身不好学生的羞辱场。

“狗崽子”是绝对不敢发言的，起来反对对联的，大多也是出身好的，包括邓小

平的女儿邓琳，叶剑英的女婿刘诗昆。就是这些人，也是轻则被围攻，重则遭殴打。如果不是工作队抢救，刘诗昆差点要被打死。以至于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对四中学生孔丹说：“你们红卫兵不能这么打人，把刘诗昆的胳膊都打断了，人家是弹钢琴的嘛，你们怎么这么过分！？”

当年北工大的学生谭力夫说得好：“这副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的确如此，对联让不同出身的学生陷入冰火两重天。干部子弟在对联的激励下，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迫不及待地想担负起接班的重任。他们穿着褪色的军装，提着铜头皮带，四处寻找“阶级敌人”。一位干部子弟在清华大学辩论会上说：“天下是老子的父母流血牺牲打下来的，老子就是要坐天下！”他的话博得满堂喝彩。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对联声中却是心惊肉跳。北京一中的“狗崽子”们被逼着一边走，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是混蛋，我是资本家……”情同手足的同窗学友，转瞬间变成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敌。

有一种说法需要纠正，即中央文革是不支持对联的。不错，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批判过对联，批判过血统论，但那是在高干子弟利用对联支持工作组之后。在红卫兵用对联冲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中央文革可是一叠连声地称赞的。

7月27日，在展览馆召开大会，各校红卫兵打着写有对联的大字标语步入会场。彭小蒙领呼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江青一旁接道：“基本如此嘛！”

8月2日，关锋在国务院接待室对群众说：“有个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这个口号到底怎么看？我看这个口号基本是贯彻了阶级路线的。”

8月4日在北师大一附中，有同学问陈伯达：“关锋讲话是否代表中央文革？”陈问：“讲的什么？”答：“关锋说对联基本精神是好的……对不对？”陈：“也对嘛，基本如此嘛！”

最权威的还是康生的讲话。8月6日晚，在天桥剧场辩论对联的大会上，康生说：“你们一切评论的、一切辩论的、本质的东西就是要不要阶级路线的问题，而不是对联要不要改几个字的问题……你们到处奔走、到处呼吁、到处串联、到处革命，就是为了这一阶级路线——毛泽东的阶级路线而奋斗，我对你们很敬佩！”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拥护对联的红卫兵大获全胜，围绕对联的辩论也戛然而止。

没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血统论不可能弥漫京城。血统论的烈火是乘着阶级斗争的东风才熊熊燃烧的。烈火中，“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先是在学校打“黑帮”、打“狗崽子”，然后冲上社会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坏、右，一场血腥的红色恐怖就此拉开帷幕。

打人基本有如下形式：

## 一、批斗会

8月4日，在北大万人大会上，彭小蒙用皮带抽打工作组长张承先，开了批斗会公开打人的先例。

8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小流氓”大会，会议有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出席。当红卫兵冲进体育场殴打“小流氓”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小流氓”几乎要被打死。

8月19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四中、六中、八中的红卫兵和北京市新团委、教育局联合组织了一次批斗黑帮分子的大会。这是一场为四·六·八学潮翻案的大会，发言者声泪俱下，听众席群情汹涌，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前台，抡起铜头皮带没头没脑地抽打被批斗者。台上无人阻止，台下齐声叫好。原教育局领导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李晨被打得头破血流，八中副校长温寒江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

批斗会上打人，残酷程度当然比不上后来的私刑拷打，但却有着非同一般的示范效应。因为是有组织进行的，所以它向社会昭示了一条“真理”：十六条以及报刊上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过是一纸空文，对群众运动并无约束力。

## 二、校园游斗

由于中央为北大“六一八”斗黑帮事件平了反，所以各学校自发式游斗盛行，中间还夹杂着班级或全校性的批斗。游斗、批斗中，暴力成风。如四中的“八四武斗”，全校的“黑帮分子”和“反动学生”统统被拉到校园游斗，拳脚雨点般落下，泪水和血水洒满校园。

8月5日，师大女附中在游斗中打死副校长卞仲耘，此后死人的事就不断发生。

8月17日，301中学打死教师陈葆昆。

8月19日，外国语学校打死教师张辅仁、职员张福臻。

8月22日，女三中打死校长沙坪、八中打死校党支部书记华锦。

被打的不光是“黑帮”，还有学生。8月25日，师大女附中初三四班开会斗争“狗崽子”，十个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绳绕过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有人动手打，有人向她们泼墨水。

北大附中“红旗”则统一部署在全校对出身不好的学生进行斗争。以初三五班为例，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许国庆、彭小清、“历史反革命”出身的晓宁、时华、“右派”出身的任冰、符芳等十几名同学均遭毒打。许、彭被打得最重，皮带抽得满脸流血。这些学生当时都只有15岁。

## 三、破四旧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之后，红卫兵冲向社会“破四旧”，抄家、打牛鬼蛇神。打击的对象很宽泛，地、富、反、坏、右之外，还有资本家、小业主、文教界人士、学术权威、民主人士、有“历史问题”的人以及流氓。如果说，打老师和同学还有所顾忌，那么打这些人可就肆无忌惮了。打人方法五花八门：皮带抽、木棍打、开水烫，钢丝鞭、刀剑……试看两位目睹者的记述：



在穿过南长街的时候……一群红卫兵在斗争一个躺在街心的老太太，他们中间一个勇敢者竟然跳到老太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的在上面踩个不停。她一边踩，一边对那老人喊叫着：“……踩死你这资本家。”（丛维熙《走向混沌》）

另一名被诬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轻女子，抱缚在柱子上用铜头皮带抽打脊背，此女一声不吭，拒绝诬服，直到贴身衬衫抽烂。于是有人提议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绑柱前，狠抽胸乳，没打几下，女子惨叫一声，立时断气。（章立凡《红八月——滴血的记忆》）

#### 四、私设监狱

从6月份开始，各中学都设立了劳改所，专门收容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反动学生”以及“狗崽子”。“破四旧”以后，劳改所也收从校外捉进来的“阶级敌人”，遂成为变相监狱。最典型的就是六中的劳改所。它是由音乐教室改造成的，有看守室、刑讯室、男牢、女牢，上设值班岗楼，安有警铃、探照灯，所内置有长、短刀，木枪、皮鞭、弹簧鞭等，日夜审讯拷打“犯人”。监狱墙上，有先用红漆涂写、后又用人血描摹的“红色恐怖万岁”六个血淋淋的大字，阴森恐怖至极。这所监狱先后打死过三人。

四中红卫兵则将教工食堂改造成“刑讯室”，食堂连接一个很窄的小巷，十分隐蔽，外面听不到受刑者的嚎叫。一个学生说：“有好几次，我早晨到校后，经过那里时，都看到红卫兵用破席子裹着死尸，从小夹道里抬出来，席子外面露出死人青紫色的赤脚”。（段若石《迷乱的年代》）

一中的劳改所是由菜窖改造的，在那里打死过13人。

此外，二十五中的“教育室”、十三中的“红色刑讯室”等等，名称不一，性质相同。城郊四十三中的一位学生说，他们学校的红卫兵，把附近几个村的“阶级敌人”都“消灭”了。

学校之外也有监狱，最著名的是吉祥剧院和东安市场（当时改名东风市场）。凡各校红卫兵抓到的“牛鬼蛇神”，想让他们死、自己又下不了手的，都可以送去。进了那里，很少能活着出来。

“劣等血统”的人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那种恐怖与痛苦，经历过的人无不刻骨铭心。

#### 错失挽救的时机

红色恐怖的荒谬，只要良知尚存，就不难看清。在疯狂的“红八月”，曾经有过几次阻止事态恶化的努力，可惜都被否定了。

第一次是8月6日。在天桥剧场关于对联的辩论会上，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红卫兵发出《紧急呼吁书》，呼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尽管他们的矛头主要指向打红卫兵的所谓“流氓”，但也对打人的红卫兵进行了婉劝。康生当场表示赞扬。据穆欣讲，王任重把《呼吁书》送给周恩来，

建议公开印刷，广泛张贴。周又呈送江青、毛泽东。大家都圈阅后，由陈伯达批交文革小组办公室印发。当穆欣印好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时，却遭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反对。穆欣分析，原因可能是《呼吁书》和会上正遭批评的“中央八条”精神一致。（《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捉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已经是在“打死人”了，毛泽东却认为“乱得不厉害”，“太文明了”。

第二次是红卫兵冲上社会之后，毛泽东找吴德听取“破四旧”情况汇报。吴德说：

当时林彪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这种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地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十年风雨纪事》27页）

其实，类似毛泽东的想法，在高层领导中普遍存在。

9月5日，谭震林对农业大学党委指示：“要青年学生闹一闹，因为自1949年解放以来，城市就没有大闹过。不大闹一下，怎么能把那些坏人清出来呢？”

9月17日，李先念对粮食部人员谈话说：“解放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服气的。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撞，又打、又斗、又抄（有的打死了）。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9月25日，叶剑英在接见十三个艺术院校、团体师生代表时说：“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党，骂我们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们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倒是林彪的说法，貌似附和，实含暗谏，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那时候已经“打死人”了。

第三次，吴德是这样说的：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70多人……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和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过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十年风雨纪事》28页）

此段记述时间有误，“1967年春”北京没有打死那么多人，而且吴德接着又说：

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直到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十年风雨纪事》28页）

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是1966年11月18日发出的，通告严禁私设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1967年春”的死人事件不可能在1966年发通告制止。从火葬场烧人的情况看，吴德说的应该是66年8月下旬的事。《重要通告》发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别到六中、东安市场等地取缔私设的监狱。据戚本禹讲，他带《解放军报》记者连夜赶到东安市场，那里还在打人。一个“女流氓”被鞭抽得血肉横飞。鞭子是用铣床旋下的铁丝拧成的，一鞭下去，白肉都会翻出来。他们命令红卫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万岁”！事后，军报记者曾写一报告，拟送呈毛泽东。陈伯达看了说：“太阴暗，不能送。”就压下了。

如果北京市委的通告能在8月发出，多少无辜的生命将不会断送。然而，历史没有如果。

### 祸起榄杆市

把红色恐怖推向高潮并直接导致大兴事件发生的关键，是崇文区的榄杆市事件。记述此事的版本甚多，基本上分两种：

其一：

“女十五中红卫兵在24日抄了李文波家之后，于第二天又到了李家开斗争会。李文波因对抄家、批斗、殴打不满，抄起一把菜刀乱砍在场的红卫兵。红卫兵因没有任何防备，被砍得鲜血直流。街道居民见此情景即上去劝解。急红了眼的李文波也不管是红卫兵，还是居民，见人就砍，其妻也抄起一把刀乱砍。砍伤七人的李文波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跳楼自杀，其妻被押送公安机关（公审后被枪毙）。”（《内乱的十年》，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关于李文波之死，当年红卫兵是这样记述的：

“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之后，从楼上跳下来，义愤填膺的群众捉住他，拳头像雨点一般打了下来，这条老狗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榄杆市前洒碧血》，载《红八月专刊》）

其二：

1998年一篇署名“鸿冥”的文章，记述了当年到李家破四旧的一位红卫兵的回忆：

“榄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那时我们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们吓跑了。实际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么，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把他给枪毙了。”（《文革受难者》 王友琴）

李文波的老婆刘文秀被押送公安局后，红卫兵要求大会批斗，并扬言要当场打死。周恩来阻止了这个大会，而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9月12日判处刘文秀死刑，同时也判处已死的李文波死刑。次日刘被处决，判决书是66中刑反字第345号。文革后，1981年3月26日，同样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又宣判刘文秀无罪、李文波不予起诉，判决书是81中刑监字第222号。同一法院，两种判决，个中隐情，耐人寻味。

然而，在红卫兵被最高领袖捧上云端，整个社会都沉浸在红彤彤的革命气氛中时，一个小业主竟然对红卫兵舞刀，这不啻是惊天大事。无独有偶，当天师大附中高三一班红卫兵去抄反动学生曹滨海的家，双方发生争执，曹用菜刀砍伤一个红卫兵。曹被抓进公安局，曹母被带到学校活活打死。一时间“牛鬼蛇神、狗崽子翻案”的喊声响彻京城。

首先惊动的是高层，第二天，周恩来在北京红卫兵代表大会上说：“昨天我们有的红卫兵被坏蛋刺伤了，我们心里很难过，想怎么办帮助你们。”“总的来说，我跟你们讲了三件事：①支持你们，帮助你们。②保护你们，爱护你们。③遇事同你们商量、宣传、解释。”

后来，周又说过：

“像李文波行凶砍人，我们是疏忽的……事情发生之后，公安局派出所不知道。8月25日出了事，就不能不过问了。”

公安系统果然过问了。8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讲：

“刚从中央开会回来（看来中央专门为此开过会），讲几点：

“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

在几个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谢富治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的吧？”谢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吴德的讲话，更骇人听闻，他说：“敌人向我们实行了阶级报复，杀了我们八个人。”

在这种氛围下，红卫兵的阶级仇恨被激化到一个新的高度。请看清华附中红卫兵宋柏林的日记：

1966年8月26日 星期五 阴

半夜一连传来了三、四起杀害红卫兵战士的事件，大家真是义愤填膺。这是阶级斗争、阶级矛盾激化的表现。文化革命要武斗，要流血牺牲……

……对敌人恨得不深，就是对人民爱得不深。你现在可怜他，他杀你时不可怜你。（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125页）

宋柏林是红卫兵中的稳健派，终文革没有打过人，赴青海串联时，还同情和支持遭镇压的八一八。这样的人都有这种看法，当时的气氛可想而知。

8月26日上午，在清华大学西操场召开北京红五类子弟大会，“声讨反革命分子杀害红卫兵的滔天罪行。”会后，各校都开始行动。

农大附中开大会，“红卫纠察队”把131个出身不好的同学拉出会场毒打。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边打边喊：“叫你们这帮狗崽子尝尝无产阶级的火药味。”

郑义记述了清华附中开打的情况：

“我们班的红卫兵小头目尤小梅冲进来，杀气腾腾地尖叫：‘地主阶级狗崽子杀人啦！他们向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举起屠刀了！’她哽咽了……一拍讲台，尖叫道：‘郑狗，你站起来！还有你，戴狗！还有……’一下子高三一班立起以我为首的四条狗。”

“哗啦啦一阵桌椅响，全班同学站起，有的红了眼，有的大哭，在誓为红卫兵复仇的悲壮气氛中向我们扑来！刹那间教室里分成几个圈儿，十几个人围殴一个，皮带、椅子腿、拳脚齐上……

“从早上八点开打，一分一秒不停地打到十一点多，直打到昏厥。”（《清华附中·红卫兵与我》1996）

最恐怖的还是榄杆市地区，一批批红卫兵乘坐专门调派的公交车从各处赶到这里，对这一带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一连几天，大量的人被打死。

新风霞曾撰文说，8月26日到8月28日，是北京打全堂的时候。她听到一个红卫兵说：“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牛鬼蛇神）一个也跑不了。”（《绝唱》，苏文艺出版社1995版）

复仇的气氛迅速由城里扩散到郊县，终于引发了大兴“八三一”事件。

### 大兴“八三一”事件

如果说城市打杀的还是资本家、小业主之类的杂牌，那么郊县清理的则是地道的“黑五类”。因此，红色恐怖在郊县上了一个新台阶。从8月27日到9月初，郊县掀起打杀五类分子的狂潮，最严重的是昌平县和大兴县。

8月27日，昌平县公安系统传达谢富治前一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要“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有的民警就向红卫兵组织介绍了当地五类分子的情况，同时也讲了谢“打死人我

们根本管不着”的讲话精神。于是昌平县开始行动了，由最初的打杀“表现不好”的“黑五类”分子，发展到消灭一般的“黑五类”分子，直至乱杀家属。十几天时间，全县24个公社就有14个公社打死人，总共打死327人。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在中越公社和黑山寨公社。

8月27日，中越公社派出所负责人召集公社副主任、武装部副部长、派出所民警和红卫兵负责人开会，布置“扫四旧”。会上宣读并印发了西城纠察队“以血偿血、以命抵命”的传单，决定全公社统一行动。当晚，燕丹砖厂声言有人搞反革命暴动，打死4人。派出所负责人赶赴现场表示支持，并说：“现在公安局打破旧框框，群众说了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28日、30日，公社两次召开电话会议，逐村公布打死人的数字，宣称“破四旧进展顺利，打死黑五类大快人心。”回龙观行动不力，会上受了批评，于是连夜打死30余人。到9月6日为止，全公社共打死144人。

闻听中越公社打杀“黑五类”，黑山寨公社公安员分别到黑山寨、辛庄两村和黑山寨中学游说，说“红卫兵打坏人没事”，“中越公社一个砖厂一夜就打死十几个人。”8月29日晚，黑山寨大队在中学操场打死四类分子2人。有教师问：“这样做符合政策吗？”公安员答：“怎么不符合？对地富可以武斗，这就是当前的政策。”同一天，经公安员批准，辛庄大队打死9人。随后打杀之风蔓延到宝川、南庄、北庄等大队。打杀中，红卫兵提出了“斩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号，因此几个月大的男婴也被打死，妇女则被逼改嫁他乡。到9月4日止，全公社共打死67人，其中未成年的孩子18人。

大兴县的打杀也是从传达谢富治的讲话开始的。县公安局根据讲话精神和市局“支持红卫兵，保卫红卫兵”的指示，在局务会议上决定，由治安科副科长张某负责联系红卫兵。

8月26日下午，张某在县公安局召开会议，参加者有河北农大园林化分校（简称林校）、黄村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和黄村镇镇长、黄村派出所民警等共九人。会上张某介绍了二十七家四类分子的情况，并分析了人都在家怎么办，家里没人怎么办，家里有人外边还有人怎么办。成立了指挥部（设在黄村派出所），划分了战斗组。具体分工是：黄村中学包一、二、三街和高米店，林校包二、三、四街，定于27日下午3点统一行动。红卫兵问：“如果被抄户有东西弄不出来，打他行不行？”张说：“在气愤之下，打两下也没什么。”又问：“打死怎么办？”答：“打死就打死吧！”

8月27日下午，黄村开始“破四旧”，当天就打死2人。张某亲临现场，表示支持。他对红卫兵负责人赵某某说：“你们要提高警惕，他们死一百个都没关系，你们伤了一个都不行。”

同一天，黄村派出所指导员和公社武装部干部联合召开黄村公社各大队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会议，指导员在会上说：“四类分子不老实，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为强。”29日，黄村公社文革小组组织四个大队的红卫兵去李庄子大队打杀四类分子，公社管委会主任则亲自去东磁各庄

大队点火。

杀人风也蔓延到芦城和天堂河公社。仅天堂河公社新立村大队就打死了 53 人。一位目睹的学生这样叙述：

“8 月 27 日那天，我们一帮学生游斗北臧中学校长马泽林。走到新立村，村干部把黑五类们押来陪斗，让黑五类们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扎进了膝盖。”“又用棍棒没死没活地朝黑五类头上、脸上乱打。学生们看出来打手露出的杀气，吓得急忙把校长团团围住保护起来。……他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类们连大人带小孩全都活活打死了。”

死人都用马车拉走，有个车把式，装运尸首时发现一个三岁女孩还有气，他把她藏在车辕下。不料在颠簸中，女孩苏醒过来，打人者发现后，把她劈成两半儿。车把式忍无可忍，扔下鞭子不干了。

到 8 月 29 日为止，黄村、芦城、天堂河三个公社共有十四个大队打死人。

8 月 30 日，天堂河公社马村大队治保主任又将全队四类分子及子女一百多人集中关起来，设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个监狱。大队书记李恩元率十几人在大队部审问，随提随审，随杀随埋，一条龙行事。夜十一点，县委书记王振元赶到马村，在一小队猪场劝阻杀人，李恩元等根本不听。王回县委，在请示了市委之后，又带十几名干部赶赴马村。

马村的民兵在村外布了三道防线，严禁外人进村。县委的人 9 月 1 日凌晨一点赶到，冲了三次，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冲到村口第三道防线前。王振元厉声喊：“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民兵经过请示，这才允许他们排队进村。同行的张连和这样记述：

“全村被白色恐怖笼罩着，鸡犬无声。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外运尸体……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锹，又装在车上运走了。”（《五进马村劝屠杀》，载远方出版社《那个年代中的我们》）

王振元劝李恩元停杀，李把杀猪刀往桌子上一拍，道：“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据吴德讲，最后还是市委派秘书长马力和卫戍区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去，才止住了马村的屠杀。（《十年风雨纪事》）结果是杀了 34 人，救出 108 人。

动手最晚但杀人却最多的是大辛庄公社。8 月 29 日大辛庄公社文革组长胡福德到黄村串联，30 日他搭乘县公安局张某的车回公社。路上胡问张：“打死这些人怎么办？”张答：“打死一个往市局报一个，市局也没有回信。”到公社吃午饭时，张某对公社干部说：“你们还等什么？等外援呢！”胡福德遂与文革副组长高福兴研究，决定当晚召开全公社十七个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秘密会议。

会议由九人小组主持，胡、高之外还有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等。公社正书记贺云喜因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遭杀。会上制定了杀四类分子的计划，胡当场宣布：31 日夜间十点半统一行动，是“拔尖子”还是

“一扫光”，由各大队自己决定。最后要求与会者宣誓：严守秘密，不做叛徒。

31日夜，全公社有九个大队杀了人，公社所在地的黎明、中心、新生、宏升四个大队同时行动。高福兴亲临杀人现场督战，批评宏升杀得少（杀2人），表扬黎明杀得多（杀11户、56人）。是夜全公社共杀死110人。

杀人的方式原始而残忍，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甚至铁丝勒的。对婴幼儿是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铡了16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井都塞满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苇塘里，杀到后来，干脆把活人用绳子套在脖子上往苇塘拖，拖到苇塘人也就断气了。

从29日到31日，大兴共杀死324人（男232，女92）。其中35岁以上195人，17至35岁75人，16岁以下的54人。被杀者，最大80岁，最小的才38天。杀死四类分子175人，家属子女137人，其他12人。涉及171户，有22户被杀绝。由于31日杀人最多，故后人称之为大兴“八三一”事件。

9月1日市委秘书长马力向全县做了广播讲话，市、县又向杀人的社队派了工作组，事态才基本上得到控制。

正是昌平和大兴的滥杀无辜，震动了北京市委和中央，“红八月”的恐怖活动才得以式微。9月2日，市委下达“紧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此后虽然还有打死人的事，但大规模的打杀风总算遏制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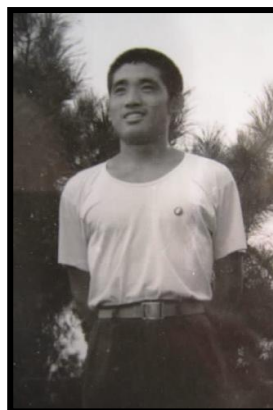
---

## 【编读往来】

### 1、建生提供原北京101中死于江西武斗的二人追悼照片

本刊上期发表的卜伟华《文革中死于外地武斗的北京红卫兵（修订稿）》中，提到死于江西武斗的原北京101中学两个19岁的中学生贺英、潘仲成。读者建生来信提供了当年追悼二人的有关照片。现附上供读者参考。

下图依次为：向遗体告别，贺英遗像，潘仲成遗像，追悼会后合影。







## 2、范世涛来信提两点意见

读过《昨天》第三期后，想到两点：

1、每期专辑聚焦特定主题挺不错的，但如果整期全是同一类文章，也会显得有些单调，读起来容易使人疲倦。建议一方面继续发挥专辑优点，另一方面增设一些栏目来照顾题材的多样性和杂志的可读性。

2、“故纸堆”栏目建议尽量不用摘录方式。对研究人员来说，只有内容完整、来源权威的文本才能方便地引用，摘录文本几乎无法直接使用。